

目 录

3. 梁漱溟与毛泽东

41.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113. 储安平与“党天下”

梁漱溟与毛泽东

并不信奉共产学说，但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有过或亲切动人，或虽不融洽却明晰且理性的友谊的，梁漱溟可谓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年。在他们几近跨越世纪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换：

起初，梁是大学教授，毛是北上求师问道的小职员，

接着，梁是“领袖”的座上客，毛是被“领袖”追逐、偏踞一隅，然而信仰坚定、信心百倍的“匪酋”；

再往后，梁是飘泊无定所且斡旋无效的中介人，毛是对峙的两强中的一方；

最后，毛是亿万人的大救星，亿万人命运的主宰，而拒绝出走国外的梁成了接受提名的客卿。

作为哲人与教育家，无论以什么角色身份出现，梁漱溟的行为不带功名利害色彩。他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周旋于大大小小的政治操作者之间，只因为他信奉“不为作学问而作学

问”，信奉冷静的思辨却热切地介入的人生哲学。不能说他不曾有过判断与措置的失误，他的学问既非“句句是真理”，也非“句句皆谬误”。如果说他的一生中有过不少岔子，往往是见识所限，并非利害使然。他与人们——包括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的交往，只基于一点：对认知的穷源竟委。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兴致、没有胆量或者没有底气争下去的时候，就算只剩下他一个，梁漱溟也坚持着，且一生乐此不疲。

毛泽东是一代雄主。伴随一代雄主的，总是对他身边人物轮番交替的恩宠与猜忌。中国历史上几乎无一人例外。毛泽东的文化人朋友可谓车载斗量。在他灼灼的光环下，他们大都个个心醉神迷，略微有些知觉了，则要么敛气屏声，要么敬而远之。梁漱溟可谓极其特别的一位。可惜毛对他的观感，我们后人所知的，只剩下发表在《五卷》中的一连串插话。这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著述，也不是理性思考后的演讲。仅由此来判断毛泽东与文化人包括顶撞过他的文人之间的交情，笔者窃以为是不公正的。遗憾的是，历史4年后（1957）、6年后（1959）又曾给过他机会，我们所期望的他的另一面仍未见表现出来，直到田家英的死谏——连这也没有使他动心。但我们仍倾向于《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我们期待新史料的发布。

下面就是这两位世纪人一生交往中的几段故事。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光绪19年），梁比毛早生70天。梁在“五四”运动之前，家居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即思索人生问题，中学尚未毕业，即生

吞活剥读毕《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及梁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论战的文字，受的是丰富而切实的自修教育。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与沈钧儒一道同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中。一来二去，特别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一位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两人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杨先生对这位20多岁的哲学爱好者颇为注意和关切。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因此，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登门拜访。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这以后，除了在北京大学有时见面，他们的见面便更多的在杨怀中家，而杨反而很少去梁家了。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前来应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从不加入。梁漱溟私忖，这青年或许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却也从未打问。后来，杨先生无意间道出，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求师问道也者。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为这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块大洋的小差事。他白天在北大供职兼修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将这位青年的名字告诉梁，但梁并没有记住。

不久杨怀中先生不幸病故。因为身后萧条，蔡校长便出面发动，希望大家资助办丧事，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一番话，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20年的片断记忆。他吃惊地向这位世人瞩目的游击英雄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七年的乡村建设工作维持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拉开序幕，时局更见紧张。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芦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民众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面抗日，似已成为事实。在这一局面下，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邀集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参议会”，其中中共代表是毛泽东，但到会的是周恩来，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

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决心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军淞沪一战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景象！特别是一些党国要员，无心抗日，或舍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或伺机中饱，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感到从未有过的悲观。继而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梁漱溟早年曾读过一些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而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而其中心就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作为国民参政员，梁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蒋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到这延安，接待他的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正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很暖和。毛泽东对梁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此时心里不由的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从来没有象毛泽东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当时

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卷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的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两个人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十年，93岁高

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依旧心绪激动不已：“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端坐，时而靠在床上，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他的晚年，那该有多好呢！”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应邀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一派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差别。恰如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在这座俯览数十代沧桑变幻的历史名城中，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虽然没有将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理得十分情

晰，在事实的面前，这位哲人与社会活动家明确承认，在看待中国前途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对的，自己是错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迫使毛泽东只身赴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政协会议代表的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为和平实现之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而筹划。一时间，在各党各派的努力下，政协达成了五项决议，全面涉及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热望今后的中国，能如欧美民主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台上台下，实行有效监督，你不行就我上台。

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一整套以法治国的做法。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的研究，使他对欧美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疑问，认为这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到延安去向共产党的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即使没有什么结果吧，也可以立此存照。况且自上次一赴延安，八年已经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恰如八年前毛泽东所预见。现在再去延安，讨论中国的前程，当别具意味。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在八

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行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多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但身份已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他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此次却已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政协会议代表。毛泽东当即同意安排。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10位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他说：“谢谢各位朋友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

他在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了，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人。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水准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

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中国必须要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即使有也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

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算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下题目，彼此去做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了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一时没有答案？”梁漱溟报以微笑，没有正面答复。他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



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先生在40年后回顾自己的二度延安行，宽厚的感慨多于犀利的剖析：“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想来当时这靠武力、靠死伤千百万人的一个接一个大战役而建立的政权，与他所怀的理想必定相距甚远——哪怕这仗是他的“中共朋友”打的，而且打赢了。长于思索，并且一定要独立地得出自己结论的这位哲学家，那时正经受着一种内心的惶恐与冲突，正是在这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无由遁入山林，更不想出国，终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他远离政权中心，仅作为一名观察者而立世的打算遂告结束。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或许因为梁漱溟新近才到北京，或许考虑到他与共和国主席的私谊，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迎候队伍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作客，长谈，再干一个通宵也成！”毛主席

如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主席走到梁的座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的居处作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毛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已在院里了。同去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堂彼此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同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抽了一口烟，这位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最后这句象是不经意说出的话，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当时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疑问。在当时，梁漱溟不但身份奇特，想头也十分奇特——起码与“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就截然不同。在毛泽东亲自盛意邀请面前，他想的是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劳。若参加新政府，便失去了为

各方说话的身份。他当时真是这样想的，却又觉不便说出。迟疑片刻，梁漱溟答复说：“主席，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这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他的脸上显露出一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到了开晚饭的时候，主人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毛、梁、林三人外，还有江青。但梁漱溟只同她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毛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这一盛情，是难于推却的。1950年4月—9月间，梁漱溟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这位前第三条道路鼓吹者受到意想不到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谭启龙，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都亲自出面会见，并征求他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以梁先生心地之诚朴，他要么没有察觉，要么有所察觉却执意逃避——他们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这一位又一位“重臣”真的看重他的学识与见解。他的座上客身份仅缘于毛对他的情份，而这身份的失却将也只由于这唯一的原因。梁先生曾有“当代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却少了世俗儒士沁入骨子里的依附意识。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毛约见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毛主席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主席先吃。于是，江青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保存到9月间？毛同江青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这位丈夫兼领袖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饭后毛立即转过来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后主席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主席说：“那也好。”毛主席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先生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在颐和园里边暂住，你就在家等讯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

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主席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主席告辞。章走后，毛主席即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如按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不堪体罚，一同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说到此，毛主席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

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主席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二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犯了荒唐的错误。”——梁漱溟自己的评断。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4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

梁先生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

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不愿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已经具备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十余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

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续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安排大会发言以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梁本人的发言。会后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在这里，对1957年的“阳谋”略知一、二的读者可能会有点感觉，就象读侦探小说的时候一下子捕捉住了作者貌似不经意，实际上匠心颇具地抛出的“包袱”。但若细细考察一下1953年在最高决策层的人际气氛，以及当事者的个人禀赋，就可知，大会主席周恩来此时的布置是常规性的，也是诚恳的，没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为，梁漱溟的直言，而且不言则已、言必有物的风格，在近二、三十年来已为各派政治力量

所共同认可。周恩来或许觉得，在讨论总路线这样重大问题的时刻，听不到梁先生的见解是个遗憾。

梁漱溟对此也没有任何戒心。不要说这次他对要议论的题目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意，就是在朝鲜战争前夕、甚至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在他的意见几乎与中共的既定方针完全相反的情形下，他有话要说也总是直说，更何况这回是周公亲自提请。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而且那天小组会上几乎全是非共产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而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到了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请梁明天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40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

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30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象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九天，农民的生活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

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天的会，毛泽东没有到场。在梁的发言之后，农业部李书城部长还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会议主席周恩来也在总结时作了补充说明，政协副主席李济深——他是梁的老朋友——甚至还发表了几句对梁的发言赞同的话。无论在当时还是30多年后对这一场面细细思索，梁漱溟都觉不出在9月11日的会上诸位的哪怕只言片语间有批评他的意思。

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①。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较真儿”。私下里或许还可容让，越是众目睽睽，越是认死理。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他一方面甚

^①：梁先生此处的记忆与正式文件有差异。按《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应是9月16日——18日，9月12日的会可能是预备会。

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但梁认为时间不充分，连复述原来发言的内容都不够。说完后匆匆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此时内心是很失望的，但不肯让步，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当即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

“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直到30多年之后，即八十年代中期，梁漱溟的感觉仍是：“实出乎意料之外！”。

周恩来的讲话从两件事讲起。一是1946年10月底，当时，国民党不遵守协议，占了张家口又占了安东。民盟是第三方面力量的代表，正斡旋于国共之间，梁漱溟是负具体实施之责的秘书长。局面很是急迫，而国共两家几乎没有什么共识，他们于是想到——

“第三方面如何提出一个折衷谈判方案，使国共双方都能接受。从10月22日开始，第三方面每天在南京交通银行一个会议室里白天黑夜开会，一直开到二十五、六号，仍然毫无头绪，莫衷一是。

“我是民盟的秘书长，在这种为和平奔走的关头，深感责任重大，也的确是废寝忘餐，日以继夜地工作的。不料头绪还没有，国民党军队又于10月25日攻占了东北的安东，关内又进攻烟台、榆林等城市，这就更加激怒了在南京的中共代表，他们大有拂袖而去之势。民盟知道后，一面责问国民党代表，一面由我和黄炎培赶到梅园新村，极力劝留中共代表，表示民盟将与中共合作到底，今后第三方面有重要的主张和行动，将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意见，以防止第三方面被蒋介石国民党所利用。

“我心急如焚，急于求得一个折衷方案，而偏偏第三方面谁都一筹莫展。于是我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在第三方面会议上提出一个原则，即只有把国共两方的方案都不算，而提出我们自己的折衷方案，其条文一要把国民党的作为尽量纳入政协决议的轨道；二要双方在利害所关的问题上，斟酌情理，互相让步。”

这个方案，当时53岁的梁漱溟拼了一个通宵起草出来，即所谓三条，并且在民盟讨论通过了，

“大家一一在方案上签了名，兴奋之中，立即决定将方案一式三份，推定张君勱、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交国民党孙科一份，由罗隆基送一份给马歇尔参看。大家立即分头乘车前往。我和李、莫同乘一车赶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代表如往常一样欢迎我们进会客厅。”

请看李维汉对接下去的情景的回忆：

“以上三条中，诸如一律就地停战，片面规定我军驻地，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等，均无视我方提出的两条，明显迎合蒋介石八项无理条件……（该文件）由梁等三人送来，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痛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踏上一只脚！^①……在我方的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

^①：对于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梁漱溟还记得的是：“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究竟为什么？……”

纠正他们的动摇。”

梁漱溟当时深感内疚，感到作为民盟秘书长，又是这个方案的执笔人与主持人，其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当天，这一方案即从另外两方面追回，事情总算没闹大，但梁个人“则已心力交瘁，当即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秘书长之职也就此辞去”。周恩来此时也平静下来，反倒劝梁漱溟说，事情已得到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先生不必过于内疚，退出和谈，实可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三思。

话虽如此说，而且后来——直到1953年9月17日那个长篇发言以前，周恩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应该说一直符合一位大政治家的规范；而从梁那面看，显然以为前嫌尽释了。但这事不可能不在周的超乎一般政治活动的深层判断上留下深刻印象。童小鹏说他几十年间只见总理发过两次火，这就是一次。

1953年，周恩来重提此事，认为“从历史上看，梁的路线明为帮助人民民主力量取得胜利，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路线。”至于所提的第二件事是指1949年蒋介石下野期间，取“只呼吁和平、不奔走和平”态度的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五篇文章^①。其实，就在当时，梁自己已经认识到这种文章“很可能为国共两方面所不满意”，而到了1953年再来读它，其效果就很是戏剧性了。对这件事，周恩来的看法是：“你的路线和我们对立的。”在毛泽东频频插话之后，周结论说：“实质是反动的，一贯反动。”插

^①这五篇文章是：《出战之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话已以语录体的形式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些讲话，嵌在他老人家已正式发表的200万字当中，实在打眼得很。很难揣摩该卷的选编者这样干，究竟怀了怎样一副心肠。如果说今天还没有哪位政治或经济学者就言论自由、政府工作程序、国会提案与辩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法宝——剪刀差等等对这场唇枪舌战作一个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剖析的话，只能说，对这两位不同凡响的老人的研究，从而也是对国情与党情——包括民主党——的研究，还差得远着呢！

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有：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

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梁漱溟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

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在当时的情景下，他显然已经失去了机变的能力，一门心思想着话不说清不行。在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人讲完后，梁漱溟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主席台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多达二百几十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以来没有过的，其中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他们的用心，可能各有千秋。对这点，即使在那样紧迫的时刻，梁也看得很清楚。其中何香凝坚持称他为梁先生——她是在那天的会上肯这样做的唯一的一位——虽然也批评他的政治观点，但承认他反蒋，并不是一生一世没作过一件好事的人；陈铭枢则请求毛泽东明确梁的问题的性质——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余下的人的态度用语，几乎与我们从《五卷》中所领略的无二致。当时，梁漱溟正迫不及待的要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

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至此，会场大哗。这种与毛主席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场面，自遵义会议之后可能就不曾有过。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看看主席台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他拿定主意，他的作法是符合会议程序的，别人怎么喊都可以不理。主席台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再度形成僵局。

会场又一次哗然。有几位即席发言，指斥梁漱溟的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

批了一阵之后，毛泽东说话了。他态度安详从容，与梁漱溟的急迫倔强恰成对照：“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的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梁漱溟站在讲台，情形就这么周而复始，闹了好一阵子。

毛泽东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

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虽然如此回答，却并未从讲台上下来。

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让不让梁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说：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

表决时，毛泽东带头举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毛泽东边举着手边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高岗接着宣布不赞成梁讲下去的举手，到会者的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立即举起手来。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李维汉同志派人告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他居家读书学习，什么地方都没再去。大概过去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

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依旧是全国政协委员，工

资也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四年后(1957年)当另外55万名知识分子应党之邀，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而被戴上“右派”政治帽子的时候，他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也就此结束了。

注：本篇初次发表时署名为：戴晴、郑直淑。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斯宾诺莎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伏尔泰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



一九四七年春，山西。

连绵的土山，风刮着，把绵密的灰吹进每一道密密绉着的衣缝。清明已过，仍不见一点绿意。

兴县，破败的小镇。作为晋绥根据地的首府，唯一的标识是间或从这个或那个窑洞式平房的窗口探出的小旗。

战斗正在几百里以外的河西进行，这里的黄昏是宁静的。

蔡家窑，晋绥行政公署公安局驻地。

一个手提砍刀的干部模样的青年人走进一孔小窑，拖出一个同为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岬。

手起刀落……

殷红的血沉甸甸地洒落到干硬的黄土地上。

死者：王实味。罪名：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没有终审判决和裁定，没有上诉与驳回，执行的依据是一份批准了的报告。

终其四十一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顶出名的、也是最早为他带来厄运的一件事，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最高层的会议上还提到的，是他那篇共有四节、分两次发表在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

野百合花

• 实 味 •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

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帐。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六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予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二十期上，读到一位同志

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

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

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这篇杂文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文艺》副刊第一〇二期。届时《三八节有感》刚刚发表，丁玲已不再主编《文艺》副刊，但这篇稿子的这一部分，还是经她的手发的。

二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大战不仅心理，而且地理地滚向全世界。

华北战场上日军空前规模的扫荡和根据地军民无比顽强的抵抗。

第二次反共高潮硝烟未灭，第三次已在酝酿之中。

正面战场大片国土沦丧。“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追求救国救民之途的青年，冲破一道道封锁，已经和正在奔向延安——这贫瘠的黄土高原，在他们炽热的理想中已幻化为无剥削、无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的圣地。就算说得实一点，近一点，也是抗战的中坚、民族的希望……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那时，康生随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已有五年。王明对掌权的国民党投降退让的政治路线已在三年前被严酷战争所揭示的真理击垮，但他们直接从斯大林本人那里薙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模式，再加上一提“托”就如靠近六十万伏高压电网般地从心理到生理的极度紧张，却有如一片阴云，正从天边游来，慢慢飘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个抗日前线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人的头顶。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九三〇年在中央苏区，将成批的“学生子”绑起来杀掉的那桩公案至今听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而且罪名也是俄式的：Anti-Bolshevik（AB团）。如果说，那时的这类举措还带着几分幼稚、盲目，几分自以为是以及原始的残忍与漫不经心的话，到了此时的延安，则因为祭起了金光闪闪的“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再加上动辄抬出财大气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颐指气使更陡增百倍。更何况，清洗者所表现出来的无须理喻与无上权威，以及要求被清洗者所显示的驯顺与臣服，与传统的中国国民性又是如此之契合……这些“佛光”在我们头顶上罩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无人可以逃脱。破的方子据说是有的，那就是无辜者、殉道者，再加上民主斗士的鲜血。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

三月十八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在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当年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了。

这所研究院是一年前由马列学院改组而成的。只要看看

将“学院”改为“研究院”，如果除去奔赴延安的人员素质的变化，就可知毛泽东此时对马列主义的态度，特别在王明“挟天子以令诸侯”般地宣示过一阵之后，已经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更加看重对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现状的研究了。

能进中央研究院的已属延安学术精英。院长洛甫（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罗迈（李维汉）那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洛甫不在时候由他代为“照顾一下”。秘书长是徐健生，党委书记是如今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言。本文的男主人公王实味那时已从洛甫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分配到欧阳山的文艺研究室，定为特别研究员（略低一筹的是研究员，之下还有研究生，比如叶群当时就属于这一档次，并于整风开始之后临时调研究院党委任组织秘书）。特别研究员的穿着与毛泽东一样，青色国统区细布。他们每月有法币四块半津贴。毛泽东可以拿到五块，原财政部长、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本人是四块。

三月十八日，动员大会开始。那时洛甫正带着一个调查团在乡下，所以动员报告是由四十九岁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作的。范文澜二十年代就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因为组织破坏而关系中断。他一九三九年重新入党，而后奔赴延安，正受托在编那本到了六十年代几乎学人人手一册的《中国通史简编》。

那时，《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早已作过，《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刚刚讲完。对于即将开始的整风，整谁、整什么、怎样整、整成怎样，用现在的眼光看，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毛泽东显然属意于一场继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领导权、

六届六中全会获得了政治领导权之后对以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清算。虽然在三年之后的“七大”期间，他反复强调“党要思想统一”，指斥“王实味在延安挂帅，我们打了败仗”，但在一九四二年的二三月间，显然并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以青委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三边的《驼铃》、关中的《新马兰》再加上别的各种形式，包括直接给他本人写信，大叫大嚷地跳出来，“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

康生，按照已经披露的材料看，应该说是一个有权势欲却没有信仰的人。作为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副手和这位领袖一步步失势的目睹人，他能在数月间顺理成章地将“王明万岁”、拥护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扭成“打倒王明”、“打倒他的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已属不易；而在三年间，竟能在组织上把与王明的攀附纠葛甩得干干净净，成为中央社会部长兼情报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以及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外加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从而成了执掌延安万名干部命运之神，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有人将其归结为他的“乡亲”江青的一援手，但也只是推测而已。中国人常常落入野史的思维定势，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但康生似乎有个天生的癖好，即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从我们下文将要披露的一个《讲话》里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手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不过是牛刀小试，真正真刀实枪地演练起来，还是在二十五年之后。

曾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不但决心改正并且正在努力表

现着的罗迈，虽然对王实味的激烈与固执未完全料到，应该说对整风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大致的路子心里还是有数的。而且，应该说，他当时的估计不但与三年之后，以及二、三十年之后的“历史结论”几乎完全一致，更由王明此后的一蹶不振、及丁玲们此后的脱胎换骨作了生动的注脚。这场运动本不要王实味们干什么：他们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发动力，他们所该扮演的，不过是该听报告的时候听报告，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写一份心得或者总结的时候就写一份交上去，如此而已。罗迈也正是按照这一不必言明的“精神”，在会前就已经跟研究院领导层通过气，决定成立以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整检工作委员会，再办一份壁报加以配合——这套“运动经”，恐怕每位四十五岁以上包括四十五岁以下的读者，对它已经象对自己的手和脚一样熟悉，不但没有在伦理、人权及领导等领域对它的正确性有过丝毫的怀疑，还练就了一套用下盲棋、结毛线、打瞌睡等“以不变应万变”的对付运动的真功夫。然而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青年以至中年——王实味那年三十六岁——还没有受过中国人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一场场“化进灵魂里，熔于血液中”的政治运动训练，对范文澜按罗迈的意思所作的布置，竟劈头盖脸地反对起来。

言词最为激烈的，据许多人后来回忆，确属王实味。他的意见其实一般得很，不过主张检委会应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别说各室主任，就是院长，能不能进委员会也要由群众投票决定。他还提到壁报可以匿名或用假名，以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

范文澜看不出这提议有什么错，但罗迈不同意。他义正

词严地陈述如下六条：(1)重要意义；(2)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3)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两方面；(4)要有自我解剖精神；(5)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是当然委员；(6)赞成出墙报，但必须有组织，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这六条，特别是最后两条，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会场上乱作一团，吵得罗迈头痛，提前退场了。最后范文澜主持表决：先表决委员会产生办法，结果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通过王实味提案。但这不过是意气的胜利。选举的结果与原方案差不多，院、室领导中只有二人未当选，而其中的一位，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①后来照样做了由罗迈召集的、

^①：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张如心，在这场整风运动中表现突出。沈潏在《怀念张如心同志》（收入《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文中的下面两段话颇能托出张如心当时和后来的耐人寻味的形象：

“当时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靳石是同志回忆整风初期的情况时说：那时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对张如心同志对他的批判，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一天晚饭后，我们十多个同志踏过铺在延河边的石块，散步到杨家岭。在杨家岭口，看到毛主席正在自己的菜地里给西红柿松土。经过介绍，他就把活停下，跟我们亲切地攀谈起来。他向大家《野百合花》发表后，在研究院有什么反映？我们十几个人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赞成和反对的都有。有个同志说：既然是民主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那么王实味发表了他的意见，反对他的人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嘛！毛主席一直默默地听着大家的争论，只是分别时最后说了一句话：《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以后又知道毛主席夜里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对研究院的思想动态十分关注。我们由此联想到张如心同志对王实味的严正批判，更感到他的思想敏锐，立场坚定。”

“作为1925年即参加革命、且参加了长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全国解放以后，张如心仅做到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文化革命开始后，“被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捏造事实，进行了残酷打击”。他“先后被监禁四年之久，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76年，当他的心脏病严重发作时，“四处求医不得。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使他悲愤不已，以至病情恶化，与世长辞”。“他至死都在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因为，“他多次对我们说，‘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很重视！’”

——笔者

实际上领导着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四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这当然是后话。在当时，王实味等人是十分激动且高兴的，高呼“民主”的胜利。

接着，三月二十三日，王实味登上他短促一生的峰巅。这一天，《野百合花》第二部分见报，发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一〇六期——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暗黑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

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嫩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象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而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

（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

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三月十七日

也在这同一天，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亲自写发刊词，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则一人在创刊号上独发两篇，矛头直指他的顶头上司——研究院领导人罗迈，《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没有匿名。

在创刊号上，文章之外还有漫画，借用“脱裤子，割尾巴”的流行说法，不点名地画了代院长照顾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那条有四、五个人护着的大尾巴和张如心自称“经批准”了从而得意地翘着的小尾巴。

在接着的第二期、第三期，罗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还就态度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有人反驳王实味，王实味也作了回击（《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总的趋势，用李言的话说：“一些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讲话的同志，则受到讽刺压抑。”^①时歪风盛行，轰动了整个延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①

壁报就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那两间权充接待室与活动室的平房里。虽然也有总编辑（陈道），但基本上是谁写谁跑去贴。反响如何呢？用罗迈的话讲：“《矢与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多。”

王实味一时间成了延安的明星。

他是什么人，又是怎么到延安来的呢？

三

一九二六年，北京。

北京大学文学院有一个支部，属于中共北京地下党市委系统。没有专职干部，一切工作都由学生兼。支部书记姓段，

^①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名纯，湖南人（此人一年后脱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做了县长之类的官）。支部干事里有一个颇受敬爱的老大哥，名陈清晨，他是河南人，是王实味的同乡和入党介绍人，后来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他曾用陈仲山的名字给鲁迅写过信，并且收到那封有名的公开回答（《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他后来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中。

与王实味同在一九二五年入文科预科，且编在同一个小组的，还有张光人（即胡风），他那时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另一名是中国托派《十月》社的王凡西，如今还常有文章发在海外的刊物上。

一九二六年秋，又有两名女学生参加到支部活动中。她们都是湖南人，是两个对王实味生命影响最大的女性。一是李芬烈士，我们在《野百合花》中已经看到。她是他初恋并且热恋终生的心灵上的爱人；还有一个是他发妻刘莹，她与他共度人生的艰难岁月，为他生儿育女，并且如今正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为丈夫几乎毫无希望的平反昭雪而奔波。沉着、刚毅的李芬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就入党了。殷实家庭出身的刘莹温柔娴静，是李芬形影不离的密友，考入北京大学以后由李芬介绍入党。

那时“三·一八”刚过去半年，而“四·一二”半年后即将发生，地下党的工作严酷紧张。王实味那年二十岁，他爱上了李芬，并且象所有年轻的恋人一样，开始写情书，请求会而。李芬对王实味评价不错，觉得他笔头有功夫，为人诚实，努力工作。当然对他好讽刺挖苦人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她接到信之后很为难。这倒不是因为当时流行于北京革命青年当中的清教徒式的风气，她有她的难言之隐。

李芬告诉刘莹，在家乡的时候，父亲因为怕女儿遭流寇的抢劫奸淫，还只十八岁就把她嫁给表兄。二人伉俪之情甚笃，年轻的丈夫坚持要家里继续供她读书。一次暑假返家，李芬怀孕坐了一顶小轿，丈夫在轿下随行。因为兵荒马乱，走得太急，这少年书生中暑，到家不久即离世。悲痛欲绝的李芬即将临盆，但在公婆面前，非但得不到一丝安慰，反被当作克夫星而遭白眼。她的父亲只好将她接回。李芬告诉刘莹，经过这样一段遭际，她已不敢奢望情感生活。她立志终生不再结婚，将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革命。正因为如此，她觉得与男同志相处须十分谨慎，所以没有给王实味回过信。但这堕入情网的才子显然粗率又急躁，情恳词切的信一封封逼来。无奈，李芬约刘莹与她一道去见段纯。他是支部书记，还是李芬的回乡，她想请他将自已的身世与隐衷婉言转告王实味，将此情了结。

见到段纯话还没说完，这支部书记即吩咐身边一个人：“去把王实味叫来！”李、刘二人怕局面尴尬，赶快走掉了。据后来别人告诉她们，王实味一到，段纯劈头命他以后“不要再纠缠了”。王不服，两人争吵起来。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李大钊已遭逮捕但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段纯决定在湖南会馆召集一次北京西城部委与北大支部的联席会议，解决王实味事件。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十多人，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

据王凡西一九八五年回忆：段纯在会上“强调王实味之所以入党，只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来参加革命的。又说在此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在此党的领导人遭遇大难，斗争万分紧张与异常困难之际，身为党员的王实味

非但不化悲痛为力量，以行动答复镇压，却拚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然不开除党籍，也该留党察看。其他到会的人都发了言。大家都批评王实味，其中尤其以陈清晨的批评最为厉害。他完全以大哥的身份来责备这位‘小弟弟’，说他不该如此胡闹。但是谁都不支持段书记的‘卑鄙动机论’，没有一个人主张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的：男同志跟女同志谈恋爱，不能算是错误；但当一方不愿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断追求，那就不好了。现在只要王实味答应不再写信，事情就算完结。我不主张把主要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平面来考虑。段书记颇不以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看法为然，但他居于一个人的少数，只好服从多数意见。结果给了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①

几乎和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延安开大会斗他的时候一样，“列席会议的王实味（记得李芬没有来）始终不曾说一句话，静听大家对他的批评，等到批评作出了结论，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结束”。王凡西又回忆说，“当晚王实味跑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情绪非常激动。他说他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会再给她写信。同时非常愤怒，极端不满段书记的见解与作风。他认为段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官僚的。”^②

很难说王实味善于还是不善于克制自己。他确实从此与李芬别过，但他不能不再找到段纯，向他大吼出自己的见解。

^{①②}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段纯恼怒已极，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接受党的批评，威胁他若是再闹就把他开除。王实味反唇相讥：“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出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

想来那时王实味一定是单独找段纯去吵的。没有人在中间缓和一下，他就这样离开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二十一岁。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生活十分清苦。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本名叔翰，一九三〇年开始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

他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他的英文底子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年之后，该校停办，他为了升学，曾经到邮局工作一年。后来发表的小说《休息》，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心情与遭际。

他积了小小的一笔钱，考入北京大学。然而只读了两年，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他回到家乡，东碰西撞数次，好不容易托父亲的学生介绍到南京国民党党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如果王实味从那个时候起就改改他的脾气甚至改变他的信念，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正讲的这个故事了。尽管受着饕餮不继的威胁，他还是一次次一言不合，即砸掉自己的饭碗。在这期间，他开始发表小说，并且与旧时北大同学曹孟君、张天翼有着密切的往来。一九二八年春，他曾在曹孟君家中住过一段。就在这时，他与刘莹再度相见。

因为缺干部，刘莹未毕业就派往北京团北方局工作，任文书。不久北京市机关遭到破坏，为营救战友，刘莹跑回家向老父亲讨要祖父留给她的一千元学费。钱未拿到，组织上

指示她赴上海重接关系。

那时他们都刚刚得知李芬的牺牲。王实味恨得切齿捶胸，只想立即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刘莹那时尚未接上关系，不能贸然介绍。然而，就在她日后已经与王实味结婚，并且正式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再发展自己的丈夫入党——她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所怀疑，只觉得他觉悟太低：心急如焚的王实味告诉她，入党之前，一定得先挣一笔稿费给父亲养老，然后再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刘莹认为将赡养父亲摆在革命工作之前这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

他们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结婚，住在菜市路的一间亭子间。当时徐志摩正为中华书局编辑一部《新文化丛书》，共收入十四本创作与十七本译著。据现在能查到的，共有王实味一本小说《休息》与五本翻译即：〔德〕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美〕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高尔斯华绥的《资产家》、〔英〕哈代的《还乡记》。与此同时，他还为商务译过一本〔法〕都德的《萨芙》。对于这几种书，曾在北大读过文科的刘莹，如今竟一本都记不起来了，足见他们夫妻当年一个埋头伏案，一个苦苦操持的窘状。这情形，王实味径直向读者招认：“为了要想法子弄饭吃，开始译这本书。所根据的是Modern Library去年所出的英译本。象许多译书的人一样，我所会的外国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独门，但为了要吃饭，却又不能不译书——因为此外找不出吃饭的法子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他那一触即发的坏脾气不变，而且总是发向那富贵的、有权势的、掌握着他命运的人。王凡西在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王实味与徐志摩的交往的描写：

“……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什么，徐竟爽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回却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等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得家来，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记》。”^①

但他穷得连买原著的钱都没有，哈代那本书，还是王凡西想办法为他买的。一九三二年春，王凡西作为政治犯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一天下午，狱吏把一包食物和两本书交给我，说是有人来探监，没有允许接见，留下了这些东西给我。两本书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给王实味购买的《还乡记》，另一本是法国福楼拜的名著《萨兰波》。从书，我猜出了前来探监的人。他那时已将书翻译完毕，特意送来给老朋友在狱中消愁解闷。”^②

从这段文字看，探监那时，正是他们夫妻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东北去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并得到几笔稿费之后。王实味终于凑出了小小的一笔钱。他回到潢川，对老父说，“拿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吧，以后不要靠我寄钱了，也不要挂念我，我革命去了。”然后兴冲冲回到上海。

他一直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左联”。“一·二八”之后的淞沪协定，把他气得日夜不宁，不停地对刘莹说：“快参加‘左联’，非揭揭他们不可！”顾顺章的叛变他是从报上看到的，立

^{①②}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刻动手写文章大骂叛徒，想想无处发表，恨恨地一次次讲：“不行，赶快参加组织报仇！”但从已经得到的材料分析，他那时候只遇上两名“共产党员”，两个人都明白告诉他自己已经参加左派反对派，并且被党中央除名。而已经接上关系的刘莹，这时被不时命令去参加的“飞行集会”吓坏了。她并不怕死。对死，早在一九二六年入党的时候就有了思想准备。她怕灵魂玷污——她亲眼见到三名女同学，熊宗瑛、刘敏和刘中一，无一幸免地在飞行集会时被捕，继而遭奸污，终于当了警官或特务的小老婆。她以为党是可以暂时离开一下的，待斗争策略改变之后再回来。谁知一离就是半个世纪，刘莹从此再也没能进入共产党的大门。但刘莹毕竟知道一些党内的严厉告诫：与“托派”们是绝对不可以往来的。在她一再劝告下，王实味作了最后的抉择：他们搬了家，割断了一切旧有的联系。按王实味的打算，再译一部书，把生活稳定一下，就去找“左联”。王凡西不知道的是，王实味那次去探监，其实也有最后道别的意思。可是在他准备接中华书局下一部书稿的时候，偶然看到前一部上有改动过的痕迹，他勃然大怒，与编辑争吵起来，一直吵到把这部译稿计划吹掉。他负气回家，没过两天，大口大口吐起血来。

他们再度陷入困顿之中。不要说全力革命，失掉了健康的王实味，已经连妻儿都养活不起。岳父接走了刘莹母子，王实味先是在杭州养病，一年以后，回河南重操教师旧业。

一九三六年春节，作为一直不讨岳父欢喜的女婿，王实味第一次回长沙省亲。见到带着一岁与四岁两个幼儿的刘莹，劈头的话就是：“现在抗日，要出来工作。”他成了妻子幼弟的当然的崇拜对象。他给他们讲抗战的道理，教他们唱《国际

歌》，还厉声告诫：“谁也不许参加三青团，否则我不认你们作弟弟。”^①

西安事变促使他最后下定北上的决心。他与刘莹商量：“不如直接到延安参加革命，我们一起去！”他作好安排，在开封等刘莹。但刘莹受父亲之委派，到武汉去接生了精神病的姐姐，迟了两个月。王实味老大不高兴：“你看看，为了自己的姐姐，就丢了重要的抗日工作，怎么这样？！”不巧刘莹又怀了孕。他们在开封找医生，胎儿竟几次三番打不下来。刘莹决定回长沙去打胎。王实味等不及，带了六名女学生先走了。他们约好在延安见，那时是一九三七年十月。

开头的几个月夫妻书信来往频繁。王实味那时在鲁艺教书，党籍刚刚恢复，看来还没有如《野百合花》中所描述的那种感受。他的信几乎全是报道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场面，可惜这些信因为怕被特务搜去，刘莹一封都没有保留。

不久，武汉沦陷，长沙沦陷。刘莹拖着儿女逃到湘西，与转信人断了联系。转信人拆开了王实味的最后一封信：“挂念你们，怎么不见回信？”她将这信重新封好，退回延安。从王实味那方面看，一定觉得妻子儿女已经在战乱中丧生。他没有再给刘莹信。现在所能查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潢川的老父亲的。一反平日风格，措词十分凄婉：“我现在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正，请家人放心。”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冬，没有回信地址，落款之后是“请《解放日报》转交”。

^① 三民主义青年团组建于1938年3月29日，王实味1936年在长沙时似不应出此语。这段话或许是他在家信中提及而为刘莹所误记。——笔者

四

当年延安知道王实味，记得王实味，与他有过直接交往并且今天还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正在服刑的陈伯达和生病住院的周扬，已没有可能回答我的诸如“您今天怎么看王实味案”之类的问话，且看《野百合花》发表两个半月之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的诸位：

- | | | |
|-------|--------------------|-----|
| 6月9日 |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 范文澜 |
| | 《“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 陈道 |
| | 《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 | 伯钊 |
| 6月10日 | 《政治家与艺术家》 | 蔡天心 |
| 6月15日 | 《关于王实味》 | 陈伯达 |
| 6月16日 | 《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 | 周文 |
| |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 丁玲 |
| 6月17日 | 《彻底粉碎王实味托派理论及反党活动》 | 张如心 |

不过八天，张如心文章的调子与范文澜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这是由于六月十五日延安文艺界举行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座谈会，且看六月十九日发在《解放日报》上的一则通讯。

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

痛斥托派王实味反动思想

建议文抗开除其会籍

（本报特讯）延安文艺界于日前假文抗作家俱乐

部举行空前未有之座谈会，到会文艺作家四十余人。当场选出了玲、周扬、塞克三同志为大会主席团。在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于托派王实味之愤恨。继之讨论托派王实味《野百合花》及《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揭发了托派王实味之政治阴谋，并列举国际托洛斯基匪徒之一贯的政治阴谋事件，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特别驳斥了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中的一些荒谬的观点：把进步的政治家与进步的艺术家的对立起来；极尽挑拨之能事，为艺术家所痛恶。所有作家并由此事件对自己作严格的反省，一致认为要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密切和大众结合之问题上，展开讨论。大会从十五日起，经过了三天多的热烈讨论，于十八日上午十二时圆满结束。

三月十八日至六月十八日，恰恰三个月。到此为止，作为文艺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已经划了最后一个句号。下面开始的，则是逐渐由托派分子变为国民党特务，又变为五人反党集团头目，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当胡宗南的一个代表团因公到达延安的前夕，借口防止“内奸们”与他直接接头，一夜之间将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二百多名党与非党干部悉数逮捕。

为期四年的囚徒生活开始了。王实味最后的那封信想来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从特别研究员到囚徒，这弯子怎么转过来的？

在他活动的那个小圈子里，王实味是有名的怪人。他是

继何锡麟、柯柏年之后第三个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的，是当时的中宣部长洛甫亲自点的名。虽然不时地与顶头上司陈伯达发生磨擦，但在四年间译了一、二百万字，不能不说是勤奋的。他的马列译著，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出版。直到一九五〇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译者王实味应得的那部分稿费“交给了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二百六十四万元（旧币，收据还在我处）”。^①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不少人回忆起王实味的贡献。但在那时，与跟中华书局打交道一样，王实味不准人家动他的东西。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一下他的译文，都被他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据与王实味在北大先后同学的何锡麟讲，只有三个人，王实味没有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是一心自己作学问，别的事不大管也不大管得清的范文澜；再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了。何锡麟说王实味与他吵是因为学经济的何指出他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用“价格”。

“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何锡麟说，“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王实味的“死对头”是陈伯达。他们的结怨可以追溯到一九四〇年，那次王实味就文艺问题发表文章驳斥陈伯达，而对方则拿政治帽子（“第二国际一些英雄的语调”）压他；后来，

^①王学文：《我的回忆》。

对外语仅一知半解的陈伯达调到王实味所在的编译室，且内定为主任（原先的主任由王实味敬佩的洛甫兼），也使他气忿。然而，若把这些仅看作是两个人文人的“意气之争”未免有点简单化。据当时也曾在编译局小小勾留的陈矩孙（陈杰）回忆，他们二人从本质讲就完全不同。暴躁尖刻的王实味最喜“犯上”，似乎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陈伯达则正相反。他当时将陈矩孙视为同乡而“面授”的“机宜”是：“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第一条，在他得知毛主席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之后，高兴得直搓手，连说：“跟上了！跟上了！”第二条也如愿以偿。虽然陈矩孙先生已于一九八七年辞世，我在这里仍不便公布他告诉我的陈伯达当时“收罗起的心腹”。

与洗星海、萧军、塞克并列，王实味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塞克长发披肩；肖军独来独往、狂放不羁，与艾思奇谈话曾掏出匕首；洗星海是因为他的宣言：“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来”；王实味恐怕主要因为他的激烈。他热切地宣传自己的见解。一次跑到住在隔壁、也是后来被定为同一反党集团成员的潘芳的窑洞，大声给他念刚刚写就的《政治家、艺术家》。潘芳是个留德的温文尔雅的学者，就算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愿附和这听起来跟当时的流行声那么不谐调的调调。这种不痛不痒的反应就足够让王实味生气了。他朝自己的邻居大叫一声——“拉倒！我找雪苇去！”转身就走了。

找到雪苇，也还是争吵的时候多。雪苇也是特别研究员，那时正撰写《中国新文学史》。在他刚调到中央研究院的时候，洛甫即对他说：

“有一个人可以接触，他有很多见解，你听听他的看法，

取得他的帮助。”

“谁？”雪苇问。

“王实味。”洛甫说。

他们二人的窑洞相距不过十米，往来自然多起来。所谈并不限于文学史，政治、生活、流行的文艺观、个人经历，无所不包。一般总是实味谈，雪苇听，直到听者觉得演讲人的观点太离谱，才反驳两句。

如前文所述，作为特别研究员，他们的制服应与毛泽东一样。王实味自己在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时候也声称，“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两在一九四一年冬，有一次没有按规定给他发衣，“王实味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同志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他，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听说，王实味只要了帽子，未要棉衣。”^①

雪苇依稀记得这件事，他本人的干部服也是该给而未给。对这种事，雪苇是绝对不置一词的。但他也不以荣孟源所说的王实味“搞绝对平均主义”为然。研究文学的雪苇认为，当时延安的平均主义思想与西安事变之后逐渐滋生的等级观念是共生的。王实味激烈抗争的，是在那时不该有分明的等级制度；当这点不可改变时，又抗议行政人员的趋炎附势。

那时延安的生活相当单调，王实味对此却浑然不觉。因为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看电影，什么嗜好都没有，唯一的享受是散散步”（刘莹语）。不少人认为他文章中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是专骂江青，从而触怒了毛泽东，并给康生以逢迎之机。这显然有点想当然了。江青一九三九年

^① 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结婚后，已不大出来活动。《玉堂春》也并不是毛泽东赏识的剧目，他热情夸赞的，是《十月革命节活报》、《逼上梁山》等具有浓厚的为工农兵、为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作品。当时出面组织文娱活动的是延安四大忙人之一金紫光。谈起王实味，金紫光心情复杂。他佩服他的学识才华，但他那种无时无事不呈露出的阴郁、激烈，不管别人怎样，自己一味忧心如焚，实在令人不快。有一次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口过，正逢他躺在一把帆布躺椅上晒太阳。见到这又快活又爽朗的俱乐部主任，王实味跳起来，把小伙子当胸抓住，指着下面隐隐有乐声传来的礼堂，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他还曾挖苦当年只有二十来岁、没读过几年书，完全靠在延安“如饥似渴的学习”而成为“驻会作家”的殷白：“张惊秋，我一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在他的观念中，腐败正在发生，延安人居然浑浑噩噩，嘻笑颜开，这本身就让他受不了。还好这两段话都是当事人多年后怀着无限感慨回想起来的。他们当时并没有在大会上揭发。否则，王实味不知又罪加几等。

现在回过头来，接着说事情经过：

三月二十五日前后，中央研究院的才子们兴冲冲地将《矢与的》粘在红布上，挂到了延安的王府井——南门口。接下去的事情，恐怕不仅他们，连范文澜、罗迈、李言和周扬，都层次不同地始料所不及。

“三月下旬，王震同志到中央研究院看了墙上的王实味的文章以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他饭骂党！’真是一针见血。

“一个深夜，毛泽东同志提盏马灯来研究院看《矢与的》，

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①

看来，这应该是在三月二十三日到底之间。因为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口气已经相当严厉：“……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②这里说的是“有些人”，并且定了“立场”的杠杠，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圆转的机会。同样有着“立场”问题的《三八节有感》的作者丁玲就是在这个阶梯上认错，表示改悔并且得到原谅的。^③

^①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

^② 参见《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载1942年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丁玲1981年回忆，第一次批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朱德、博古、贺龙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文艺界参加会的只有我和周扬两个同志。我印象很深，并感觉奇怪的是曹轶欧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对《三八节有感》的批评。我当时想曹轶欧不是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也这样关心文艺上的事？接着有好多同志发了言，贺龙同志也批评了我。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写文章骂党骂我们的领袖？！’（当时采访者插问：‘有人说是王震同志讲的？’）在会上批评我的是贺龙同志。王震同志后来自己告诉我，他也这样说过。（看来延安当年不仅物质匮乏，连语言也匮乏得可以。要么就是这句话实在太精采了，弄得人人争说。——作者谨按）我体会，当时好多批评对我还有些照顾，好多同志关心地瞧着我，好象是怕我受不了。博古同志走过来坐到我的身边，悄悄问我：‘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我很坦然。第二天我去看贺龙同志，他是我的同乡。我知道他说话直爽，有什么说什么。我到他那里说，不打不成交，还有什么意见请再指示。他爽然大笑，没有提出更多的批评。过了几天，贺龙同志特地来文抗看我。这次高干学习会，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在发言中，毛泽东同志把我和王实味分开了。毛泽东同志说，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王实味是托派。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当时保了我。”

由毛泽东经手的这一“分开”，具有长达数十年的时效。1978年刘莹赴北京申诉时，举目无所识。想到了玲是当年的“同案人”，且王实味30年代为赚两个小钱糊口，还曾替她批改过作业本，或许可以道道原委。从作家协会问到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把一切都问清楚之后，停了好一阵子，回答说：“丁玲同志不在。”刘莹虽然对1942年的一切包括这次高干学习会上毛泽东的“分”一无所知，总算间接感受到了那令人酸楚的阴影的浓重。她从此再没有给这位饱受折磨的作家挂过电话，虽然明知她不会永远“不在”。——笔者

当然一九五七年的“再批判”又是另一回事了。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这期间曾经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①

但即使这样，中央研究院欢呼民主、同意王实味的人仍占多数。四月三日，中宣部在总结了他们前一段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之后，发出了《四·三决定》。三天之后，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指出：“整风发动中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后两个，即“青年有不满和不安的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则直接联系着王实味。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那次似乎没有点名，但王实味“鼓动”青年发“牢骚”，要领导“听一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还呼吁艺术家“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则已尽人皆知。与会者是不会对毛泽东的这番话产生误解的：为了达到最初预想的政治目的，他老人家不得不亲自出马应付一下这类横下里杀出的障碍了，虽然话还未如一九四五年开“七大”的时候讲得那么明白：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

^①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

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接着，四月七日，“好好整风”在中央研究院终于开始：“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凯丰同志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四·三决定》的精神，严肃地批评了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这样，就使大家头脑一步一步地清醒过来。开始把研究院的整风引上正确轨道。”^①

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这是运用组织手段解决学术与思想问题的开始。但那时，“一步一步地清醒过来”的负责干部、积极分子和研究员们依然没有抛弃王实味，他们希望他也能接受批评，改变观点，起码明智一点。

范文澜当时在一次大会上说：

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晨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

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不少。他仍旧不反省。

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

^① 李育：《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

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①

整风期间临时调到研究院党委担任宣传干事的温济泽最为苦口婆心。他一直将王实味看做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的同志，直到批判已成定局，还去看他。与范文澜的描述不大一样，在温济泽娓娓的劝导面前，王实味已经没有了三月间的气势。他觉得自己一心为党好，意见也提得对，为什么要这样整？太冤枉了，实在想不到。温安慰他：

“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

王实味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听小温这么一说，倒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

“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

温济泽跑去找党委书记李言：

“我看王实味这人就是思想片面，观点不对头。现在他认错了，我们是不是不要提高到政治问题？”

李言听了未置可否。过了好一阵，缓缓地说，“你让他严肃点。你是代表党委的，不要让他感到什么。”

温济泽连忙分辩：“我可没代表党委，我就代表我自己。”

第二天，李言把温济泽叫到一边，神色之间颇为沉重，象是也吃了批评的样子：

“昨天的事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他说你有温情主义。还有一个情况，不能和别人讲：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还是蓝衣社特务。他和别人不同，不是思想问题，你在党委工

^① 温济泽：《斗争日记》，载1942年6月28、29日延安《解放日报》。

作，行动要注意。”

温济泽再温情也不敢再有自己的主意，当然也不再找王实味了。

接着是中央社会部的介入。他们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的言论及平日表现的材料。

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去看王实味的档案。

《矢与的》从南门口撤了回来。纠偏之后，出了第六、第七期即告终结。罗迈又重申他在三月十八日会上的观点。与上次台下乱成一片的情形相映照，这回听众个个敛气屏声、心悦诚服。

五月二十五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那篇直到他本人去世（有一说认为直到如今）一直为此间的文艺界奉为《圣经》的讲话。《讲话》“扫除了关于文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争论问题，是整风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大争论反映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结果”。^①艾思奇去听了并且回来作了传达，大家均感茅塞顿开。出于“促进文武两条战线同志结合的考虑”，毛泽东请“长期在军事战线从事斗争，戎马倥偬”、当时“正率部屯垦卫戍延安，任延安警备司令”，并且对《矢与的》墙报有着最“旗帜鲜明”的表态的王震担任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震“再三陈词”，表示“担负不了这个任务”，毛泽东主意坚决：“就是要你担负这个工作，要你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同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

文化人打交道。”^①

五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开始。

五

无论是光荣、是耻辱，还是三句五句、十句八句，乃至长篇巨帙都难以说清的动机与效果，这五月二十七日开幕的座谈会，无疑应载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值得有志于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与沿革的学人反复咀嚼。

开头的五天，泛论党的民主与纪律及整风问题。最先发言的人都反省了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所表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即只想“割大尾巴”（领导的尾巴），还否认各位领导是领导运动的当然成员。对此说，有人持不同意见。

最先在会上提出王实味问题的是李宇超。他特别强调，“有偏向的人虽多，但与王实味根本不同”。想来这一讲法定让在场的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人站出来反对，认为他的发言中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到了第三、四天，会上已无分歧意见。罗迈在他一槌定

^① 王震：《满腔热情地对待人民事业》。王震自那时起即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挚友”的名声，直到在本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还有记者不断提起。也有人将他比做“中国的巴顿将军”。说这话的人想来对战史不大熟悉，只注意到了两人都喜欢在公开场合骂大街这一性格特色。1976年以来，王震的几次淋漓之骂令人难忘，特别是对走上街头的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生。

——笔者

音式的发言中点明：“王实味的立场和我们党的立场是相对立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他的错误绝不能和我们同志的偏向相提并论。”^①

象暴风雨前的闷热一样，所有的人都预感到那必然出现的高潮。终于，隐隐的雷声滚了过来：这天傍晚，“有一部分同志向座谈会主席团提出，民主集中制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希望在下次的座谈会上，把王实味的思想实质更清楚地研究一下。主席团采纳了这个建议。”^②

接着，休会一天，将王实味在报纸上和壁报上的文章作为材料下发。

再下一天的实质性批判吸引了上千人参加，即所谓坐到了操场上的“大座谈会”。潘芳、雪苇提供的材料，把会议推向高峰。

雪苇揭发的是王实味的托派言论，这本是他们两人经常争论的问题。王实味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应由斯大林、鲍罗庭而不应由陈独秀负责。陈当时的意见并不错，不过没有顶住就是了。对于文学，王实味说他赞成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他认为居于长期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可以产生本阶级文学，无产阶级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没有文化，取得政权后，又很快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所以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文化。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

^① 王德芬：《肖军在延安》，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② 温济泽：《斗争日记》。

好”，他认为未必。依他之见，“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出强有力的论据，革命以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为数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他还盛赞托洛茨基的文采，说“即使经过翻译，还看得出来……”雪苇当然是反驳他，指出“托陈取消派”的危险，强调文艺为阶级为政治观点服务，还指出关键在于立场，否则文采越好危害越大等等。王实味同样没有被说服。然而在大会上——

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出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向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他对党和目前整风运动的根本认识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污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了；他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他说“在本院民主问题上，范文澜同志和罗迈同志是两派”，他用“硬骨头”这个名称企图去拉拢一部分同志，又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词去打击另一部分同志。

末了，艾思奇同志宣读王实味反驳齐肃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在这篇文章里，他

不仅继续污蔑党，而且以青年领导者自居，以现代的鲁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在听到后面这些肉麻的词句时，会场中响起一阵一阵带着鄙视意味的哄笑。^①

此时，雪苇已经不可能告诉王实味，他们私人间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是他在无意间向徐健生提起，觉得这场争论挺严重，王实味确有托派思想。徐健生将这话对李言讲了。李言拉徐一起向罗迈汇报，罗决定雪苇在会上揭发。

雪苇也没有料到他的发言会造成这样一种效果。他在后来的讨论会上一再解释：“他确实有托派思想，但上升到组织问题现在还没有条件。”这种态度使罗迈十分恼怒。

但三十九年之后，一九八一年，罗迈委托温济泽等人编写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对于文中涉及王实味的地方，温济泽等人提出“说他是托派一直没有根据，是不是不要提了？”罗迈表示，“就让它保持历史原样吧，谁也没有那么高明。”随后即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报告，请求对王实味问题重新审定。^②

雪苇是在医院遇见当年的小温的：

“你一定要出面替王实味平反。是我在会上揭发他的。我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是这样的结果。要不然，我死了也心里不安。”

^① 温济泽：《斗争日记》。

^② 李维汉一年后即离世，在以后的这六年中，按照他的遗愿，温济泽除了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传记外，不停地呼吁、恳请，递报告，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这一过程，已经又够一篇《王实味续篇》。——笔者

然而在当时，正象一列已经开足了马力的列车，谁也不敢、而且也无^能力去挡一下了。六月二日——

今天上午，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党要求。他说“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求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

散会后，大家纷纷议论着王要求退出党的事情。在晚间，有几个同志去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①

这谈话者中有谁，一直未能找到，但王实味显然受了感动。六月四日的会他出席了。据温济泽当时记载：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而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底身上。今天是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②

据何锡麟回忆，与王实味同时出现的，是他那把有名的帆布躺椅——也许他那时已经病得不轻，也许一九四二年的延安青年毕竟不同于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即使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艾思奇语）也未搞肉体摧残。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是又进了一步了。

还是温济泽当时的记载：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

①②温济泽：《斗争日记》。

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底‘爱’感动了我。”

“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一九二九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

(王凡西)等托匪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还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四〇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我要求王实味对下列托派观点,表明态度:第一、托洛茨基在联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对于苏联农

民问题的观点，……第二，关于列宁遗嘱问题，……第三，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王实味曾经和我争辩过的。”另一个同志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并且说：“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

“这些问题你向党组织提出过没有？为什么不向党提出要求党帮助你纠正？而你偏要到处乱讲？”

王实味不能回答这个反问。

休会的时候，我和王实味一路走出来。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我冷笑了一声。

下午，他没有出席。^①

他从此就没有再出席过任何座谈会，包括六月二十三日的“批王大会”。

在这九天中，“运动转入个人写思想自传和进行总结的阶段。”^②用艾思奇的话说：“每个人根据党风文件学习所得，来对自己的思想意识作一个历史的全面检讨，从社会的根源上、历史的发展上，分析了自己思想意识的具体形态和现在的矛盾，并考虑以后努力的方向。这一历史的（也可以说是科学的——虽然做得不够）检讨，使每个人对于自己获得了一个清楚认识，规定了更切实的改造自己的方法。它的作用，比较那部分的反省和个别问题上的自我批评有更大的意

^{①②} 温济泽：《斗争日记》。

义。”①

两个半月前还“乱作一团”的延安知识界静了下来。王实味被开除了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会籍。与此相映照,“大家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热情诚恳地互相帮助,愉快地放下思想包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犯有错误的同志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其内容与四十五年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去不是很远:“只要民主,不要领导,只要自由,不要纪律”……②

丁玲此时起了带头作用。她在会上讲的一段话,至今许多人都记得:“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虑和错误,就象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我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下去。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③

这位《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三八节有感》的作者,后来果然写出了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然而,在她晚年的自传体创作中,只写了三十年代的《魍魉世界》与六十年代的《风雪人间》,却缺了对这大彻大悟之后的奋进的一段实录。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位作家:

六月初萧军随“文抗”的同志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一次批判王实味大会,对会场上的混乱现

①②③ 佟冬,《漫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象不以为然，在归家的路上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被走在一旁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向“文抗”党组汇报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找萧军，向他提出了抗议，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被萧军拒绝了。为此，萧军写了份书面材料上呈中共中央毛主席，说明了事实经过，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把这份书面材料取名为《备忘录》，在“文抗”一次整风小组会上宣读了一遍。为此，当场和五名党内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还有两位党外作家陈学昭、艾青，在讲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晚上八点到深夜两点约六个小时还没有收场，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要看个究竟。萧军在讲台上“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当时吴玉章同志作为大会主席正在讲台上，他看双方僵持不下就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

萧军听了吴老的话，气消了不少。^①

萧军与王实味其实素不相识，也从无来往，但“同情王实味”实在成了一块印在他额上的揩抹不去的标记，从此失去了“进入圈子”的资格。

思想斗争阶段以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整整两版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为结束。周扬称“王实

^①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

味并不是什么值得多提的东西”，但他又严正指出：

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场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茨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他们根本不信任大众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能力。对于大众，他们完全是一种贵族式的轻蔑的态度。他们把艺术和政治分离，实质上就是把艺术和大众分离了的原故。

四十一年之后，当他终于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从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提到人道主义与人性时，受到了与王实味相比虽然有些形似却轻得不能再轻的批评——无论从火力组织还是实际伤害程度而言。周扬思想的转变——如果有的话——肯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七年他克尽厥职的工作，至今令人难忘。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九六六年三月间毛泽东突然把中宣部称作“阎王殿”的时候周扬所受到的震撼。其实，以他的聪敏，若肯细心体察的话，或许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就会提出疑问——当时，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有一封信给那时候的中宣部长凯丰。在这封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发表的信中，毛泽东提到“解放日报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并亲自出面拟了一份《解放日报征稿办法》，规定“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的稿件外，请下列同志负责征稿”。①

文中开列延安文艺界及非文艺界人士共十多位，据舒群

回忆,其中有老柯(诗人柯仲平),在他的名下注有:“以大众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一位革命领袖,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年代,对文化与宣传亲躬到如此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足见景况之窘促。对于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通常总要诱发一个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一命题,周扬当时究竟是不以为意,还是不认为它与延安的革命有什么干系,那是后代中国人不得而知的了。然而,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批判毕竟开始了。一年半之后,他中风入院。作为回答,他已没有别的方式可选择——这年他七十六岁。

六

王实味与托派组织,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王实味被捕后,中央社会部并没有再理会“蓝衣社特务”、“反党集团”等连康生自己也觉得水份太大,只能用来吓唬人、扣上就拉倒的帽子。他们集中追查,并且也提审过几次的,只有他与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

据凌云回忆,第一次审讯是王实味被捕后不久,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拘留所进行的。王实味进得门来,对任何人不予理会,径直走到挂着列宁像的墙前,深深鞠一躬。当时没有条件内查外调取证,唯一的办法是问口供。社会部的

① 有人对此持相反的意见。温济泽认为《解放日报》撤掉《文艺》专版是为了上更加生动丰富的综合版。他认为《讲话》之后文艺创作繁荣,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他记得曾有一则报道说,1949年南京长江轮的起义,并不是有什么文件下达,而是义士们听了《李有才板话》的广播。

人对王实味还是很客气的，“抢救运动中颇为时兴的逼供、诱供、车轮战等，在他身上都没有用过。提审常常变成王实味在那儿大发宏论。”（凌云语）

问来问去，还是他那两个老同学：“无产者社”的陈清晨和“十月社”的王凡西。

据王凡西自己的回忆：

“王实味与我在上海来往了大约一个整年——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他为译书忙，我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忙，彼此见面次数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达十次。除我之外，王实味当时与之来往的，据我所知，只有陈其昌，即延安整风时多次提到的陈清晨（顺便说一下，此人亦即后来给鲁迅写信的陈仲山）。陈其昌当时也因赞成反对派而被开除，他属于陈独秀派。不过王实味却从未加入托派，既不曾参加我所属的“十月”派，也不曾参加陈其昌所属的‘无产者’社。

“政治上他是较多同意托派主张的。特别对于当时中国局势的估计：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呢，还是革命业已失败。他认为反对派的看法比较正确。但他怀疑反对派另起炉灶、重建新党来领导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终留在党内，即使被开除也不要企图自立门户。他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是他后来设法回到党内，并奔赴延安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些并不是他与我偶尔会面时谈论的主题。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那时我正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王实味英文程度好，我请他帮忙译一点，他答应了，译了两章，

《纽约》与《集中营内》。这件事，据后来延安文件上说，王实味曾自动向党组织报告了的。又说他曾替托派翻译了列宁的遗嘱，此事我却不知，可能是经由陈其昌的关系，发在王独清编辑的公开杂志上的。

“王实味和我，以及他和托派的往还，据我所知所忆，尽于此矣。一九三一年五月，我被国民党拘捕，最后割断了我与他的往来。”^①

关于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王实味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而这一无谓的固执，实际上变成了他“割不断与‘托匪’感情联系”铁定的凭据——更何况他列举的种种，在立场、觉悟、党性等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也如草芥般微不足道：

一九二六年，陈清晨的妻从家乡到北大探亲。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地跑进跑出的样子。一九三〇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名，陈清晨曾把三十元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全部送当所得。而王实味至死不知道他惨烈的据躯。

对于是否参加了托派组织这一要害问题，如今尚在世的王凡西作了明确的证词：

^①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我要以‘被告’的证人资格，向可能重新审查王实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陈述：

“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

“我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新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①

但雪苇认为王实味对他讲了不少托派们为争地位而闹分裂的事，表示极反感。雪苇怀疑他是不是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凌云作为提审者与材料汇总人，记得王实味自己承认过曾参加托派组织，但这批材料在一九四七年延安撤退时，已在瓦窑堡开箱焚毁。凌云不记得王实味曾提出过比四〇年向

^①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组织主动交待时所提到的更多更新的材料，也不排除他有出于对审讯不耐烦而顺口乱认的可能。同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前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记得在王实味自己填的干部履历表中有“参加过托派组织”字样。但也是同期在中央社会部，并负责将王实味由延安押往山西兴县的前驻比利时政务参赞刘祥伦记得的是，王实味不但在提审时，而且在解押的路上一直抗议说，他不是托派。

他有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

历史在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托派组织全部成员自一九五二年一揽子捕尽之后，又于一九七九年全部释放（倘使还活着）。当时的领袖如郑超麟先生，如今已作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释放与人事安排都是在他郑重声明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与行为准则的情况下作出的。

将“托派分子”作为王实味的罪名，也应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吧。

七

这年夏天，王实味的罪过在延安才子们口中，尽管措辞已到“反党思想”、“反党活动”的层次，应该说，实际措施还未越过思想批判这一级。

到了秋天，规格升了上去。现在可以查到的确切时间是十月三十一日。在那天的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声讨“反

党五人集团”的座谈会上，已将他们定为敌人。

原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杨尚昆此时已调中央，任总学委副主任。他没有参加前一段的整风领导工作，也未参与中央研究院及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的批判、定性。我们在下边将要读到的这篇文情并茂的发言，显然是依照党内的规矩，按照已定的口径所作出的。杨在发言的开头即称：“十多天的座谈会，揭露了王实味、潘芳、宗铮、成全、王里等五人反党集团的活动，揭露了他们的托派思想、反党阴谋、小组织活动、反党手法……”

直到今天，在延安“老人儿”们上百万字的回忆材料中，对这段不平常的日子，有赞颂，有感怀，有遗憾，却不见一篇文章论及究竟为了什么要在那惊心动魄的“抢救运动”开始前一个月，非得率先将王实味们提到这个高度。或许在当时的环境里不能不特别强调“思想统一”？因为杨尚昆讲话矛头所指，主要是“党内自由主义”：

“这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早日揭破？为什么他们的活动能收到若干成就？为什么他们能获得某些同志的同情？为什么有些同志受了他们的利用呢？……我想是由于他们在党的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弱点，主要是普遍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即缺乏政治嗅觉而政治伤风、缺乏坚定的原则立场）！”^①

“我想，党内生活，应该是政治的，有原则的。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原则去看党内生活，去处理党内的生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喜欢在党内评头品足，喜欢打听别

^①杨尚昆：《托派王实味的活动与党内自由主义》。

人的‘秘密’，喜欢注意人家的私生活，甚至吃了小米饭无事可做，专门‘小广播’、‘串门子’，对政治问题、对原则问题，则毫无兴趣、毫不注意，这样的人，要称之为共产党员，我想是不够资格的！”^①而这不够资格的表现则是：“听了他们反党的言论不觉可恨，反党可喜；看了他们反党的文章，不加批驳，反而赞扬；见了他们的反党行动不向党报告，反而对党隐瞒……等。难道这是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吗？这是十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②

想来，“自由主义”在当时确是革命的大敌，显然比封建家长制、专断跋扈、以权谋私、腐败无能等等等都严重得多，从而对革命的危害也大得多。

现在已知王实味的罪名（特务、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分子）是不实的了，我们于是可以用“罗织”这个字眼。王实味们的罪名是怎么罗织起来的呢？在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这么用太武断了；也许是误伤呀！也许是心太急、情太切、好心办了坏事呀！也许是分寸没有掌握好，稍稍扩大了一点呀……。确实，直到今天，何锡麟还认为，王实味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动由洛甫掌握，情况可能就不大一样了。^③

①②杨尚昆：《托派王实味的活动与党内自由主义》。

③遵义会议之后即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长的张闻天（洛甫）那时充分肯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中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早在1940年底，这位总书记即将他们视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一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决定的力量”。这一认识与估计，在1942年就已相当落伍；到了1943年，在凯丰为部长的中宣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已被暗指为“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

——笔者

请看康生的讲话：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觉得，十四年之后的“引蛇出洞”等等，简直没什么创造性可言。

但“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分属三个单位，怎么捏在一起呢？还是看康生自己的话：

“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

但这点小困难能难倒康生么？他找了一个叫于炳然的当突破口：

“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

但群众还是没有起来，和王实味也没有联上：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起来了。后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骂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开了五天会，不讲成、王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两口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什么问

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王实味的人性论骂出来了？……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托派分子帽子，……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斗争很迂回、很细密……”

这是康生一九四三年八月在一个训练班上的讲话。训练班看看后来历时三十五年、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几乎没怎么间断过的类似景象，很难不令人想起“名师高徒”说。

直到一九八二年，这“反党集团”才一一平反完毕——这样说也许不确，因为王实味的正式结论，至今未作，只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的一页注释中提到：“……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其实，这两对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是浅且疏的：一九二八年底，王实味在山东教书，经堂嫂曹孟君推荐，王里曾去拜望过两次“思想进步”的王实味。王里与潘芳之妻宗铮曾是上海的复旦同学。当他们分别都到了延安，王里夫妇去探望宗铮夫妇时，顺便看了看住在隔壁且正病着的王实味。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王里那里得到热烈响应。颇怀同感的她说：“你写，我给你供花籽！”——这是现在查出的这五个人在延安加起来不足几十小时的交往中份量最重的一句话。

五人之中，认错态度好的潘芳解脱得最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就放出来工作了。为免去调来调去的麻烦，他没再回中央研究院，直接从中央社会部的囚犯变成工作人员。今天，潘芳是安全部老资格的顾问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四十三年前被捉到这里工作的。”

宗铮没有他丈夫那么柔顺的脾气。她坚决拒绝通过支部

讨论重新入党，五年前愤然辞世。性情最为刚烈的成全在“文化革命”中自杀了，虽然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过他们夫妇的问题，“是黑夜里的白刃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年近八旬的王里如今病卧在床。

八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进犯陕甘宁根据地首府。军事史上最为机智、最为神出鬼没的延安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在这之前的两天，三月十七日深夜，中央社会部奉命将他们原交延安保安处代管的犯人王实味提回来，押解到“后方”——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这里是贺龙的防地。他当时是七大中央委员、五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司令员。

如果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那次大逮捕算起，王实味这批人已有四年囚龄。他们养猪、种菜、纺线，并且逐个儿被释放，重新安排工作，日子并不比监外人苦多少。不过这类活儿王实味都没怎么干，他是“大知识分子”，那时对待大知识分子并不象一九六七年那样。虽然早已不再提审，却依旧关着。到了四七年春，社会部的犯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四年里，他还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外事活动”：一九四三年夏末，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团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时，曾请求会见“这位作家”。负责接待的王震立刻就答

应了。几周后，王实味被带到他们面前。据当时中央社记者，现台湾“国策顾问”魏景蒙回忆：

当王实味与我们正面相对时，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我是个‘托派’。”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前感激不尽。”

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又一个中外记者团赴延安，其中一位是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宣部任职的杨西昆（三十年代北大学生）。这显然是个统战的好机会。这边于是临时凑起一个由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座谈。

王实味再度出马。《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他的《延安一月》中就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但这里说的显然不是这次。这次座谈会共有二十多人参加，当介绍到王实味的时候，杨西昆着实吃了一惊。王实味当场发表即席前说。大意是，我在延安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却说我被迫害致死了（指西安曾经闹过的一场被时人称为“活人追悼会”的滑稽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实味等人）。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要是我的亲友知道了，该有多么焦急难过？由于你们的封锁，我与家人都无法通信。因此，希望杨同学回去后，利用你的工作之便，帮助说明我的真相，我将十分感激。

看来“杨同学”并没有将这囚人的托付放在心上。也许因

为官场中本来就人情浅薄，也许他自己就将这看作是作态宣传，总之“父母妻子”方面，什么信息也没得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深夜，他们出发了——几名社会部的青年科员，加上一个囚犯。在路上走了大约一个多礼拜，翻山、跨沟，自己背行李。过黄河的时候，乘的是一种随时会翻掉的方头木船。王实味倒没有自己背东西，但他发过几次脾气，说自己“不是托匪、不是特务”，科员们于是喝令他“不要发谬论”。有的时候他干脆不肯走了，让押送他的小伙子们找担架抬他。

凌云曾在临县到兴县的路上遇见过他。这位前特别研究员穿了一身灰布棉衣裤，拄着一根木棍，前后左右并不见看守，一人踽踽而行。见到这位三年前在提审的时候认识的中央社会部的老相识，王实味显出很亲热的样子，走上前，双手拉住他，告诉他自己是“和部里一同从延安撤下来的”，“走得慢，掉了队”，还抱怨那几个小伙子不好好照顾他。凌云当时正在土改工作团，就站在路边劝了他几句。他怎么也没料到这是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晋绥那时并无战事，而且毛泽东曾明确无误地指示过，对王实味“不要放也不要杀”。

但提刀的晋绥公安局总局预审科看守所的看守员确实是依命行事，而且这命令也不是他们的处长或者局长就下得了的。总之，一九四七年暮春的一天……

事情过后不久，毛泽东就知道了。传说主席大发雷霆，一定要李克农再赔他一个王实味。李克农未作任何分辩，只是一次次检讨，请求处分，口头、书面……毛泽东显然一直意难平。他老人家本已批示过“已检讨即可”，但还是不止一

次在会上点。郁郁于心的李克农五十年代末因突发性脑溢血辞世。

是李克农决定杀的么？他先是把这名强加给他的犯人寄在周兴的保安局——情报部的犯人都已释放，拘留所自然就不存在了——又命令自己部属将王实味好不容易从延安解了来，找到地方寄放，难道只为换个省杀掉？而且，潘芳在临县遇见李克农的时候，两人说起王实味，李还笑嘻嘻地警告他：“小心，他会骂你的！”

按照当时的组织系统，中央的一个部不能直接给地方的公安局下命令，也不能向中央下属的分局打处决报告。更何况李克农无权独自决定这样一件事，对王实味的处理必须经过一个由数人组成的委员会……

命令只能出自贺龙。据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回忆，贺龙本人曾在李克农屡屡检讨的时候出来承担：“是我批准的。”毛泽东对他没说什么。

但他为什么要处决中央社会部寄在他那里的犯人呢？

当时，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中原进犯与突围，还有稍远一点的苏中、定陶战役都已发生，国共双方，正是“打红了眼”。有人记得，就在这前后，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文件或者“精神”，即在战斗环境下，如果带着犯人行军作战有困难，当地领导人有权处决。

但当时晋绥并无战事，总局看守所关押的犯人也就不止王实味一个，为什么他偏提他？

据推测，王实味“死不认错”的态度可能一直延续到将他交给晋绥方面之后；或许他没耍态度，但有谁能保证，他这种“延安名人”，不论落在谁手里，不给对方造成一种“一杀而后

快”的心理撞击?“冶容诲淫”不是中国历来的逻辑么？联系起贺龙从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的时候就立场鲜明、态度暴烈，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对王实味之流着实是恨透了的。在肉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他难道会对一个“托匪、国民党特务、反党分子”有丝毫的怜惜之心吗？而且他那时可能根本不知道杀人还须有个法律程序。

不知贺龙决定这样干有没有同李克农打招呼，如果打了，也不知是在杀掉之前还是之后。对此，李克农是绝口不提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为躲避受人指使的“小将”们的揪斗，贺龙被周恩来藏在北京郊区一处冷僻的民房。在那里，他“写成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请周恩来转呈毛主席”。^①贺龙能征善战、功勋卓著，建国之后仅仅分管体育运动。想来那时不知有多少往事风云在这位老粗出身的元帅胸中翻滚。但使他按捺不住的，竟首先是胸中的愧疚。他那时显然没有想到王实味。二年之后，他凄凉地死于“误治”——也有一说是“有意延误”之中。与王实味一样，当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诬谄的罪名依然顶在头上，妻子儿女也不在身边。

九

两年半之后，一九四九年八月，从湘西回到长沙的刘莹，

^①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带着两个长大了的孩子——十八岁的女儿王劲枫与十三岁的儿子王旭枫，正站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他们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王实味对赤色可以说有着执拗的癖好。如果说，父亲的样子还依稀留在劲枫的记忆里的话，旭枫所怀有的，只是一串妈妈的悄悄话联成的概念：“爸爸参加共产党了”，“爸爸在游击队里”，“爸爸跟着义勇军打日本人去了”。他们当然不敢期望能在过路的队伍里发现离别了十一年的亲人。但依旧抑制不住泪水满颊：“我们的队伍回来了！看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多么强大！”

他们等着父亲的信，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没有动静。这年年底，刘莹直接投书中央组织部询问，回信很快就来了：

“王实味在敌人进犯延安的时候，主动要求到敌后去工作，得到批准。从此即无消息。”

刘莹想，他一定是在敌占区牺牲了。今后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加倍努力，把子女抚养成人。她主动向当时驻长沙的十二兵团请求分配工作。也许有意，也许无意，他们将她们母子三人分配到老远的北方——吉林。

但丈夫的死毕竟没得到确认。在一九五三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刘莹再次向所在学校组织问起王实味的下落。学校的领导什么话也没有讲，只递给她一本名为《思想指南》的小册子，里边有一篇陈伯达批判《野百合花》的文章。此时，刘莹才知道，原来丈夫在延安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以后又怎么样了呢？一九五六年，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儿直接写信给陆定一。回信的依旧是中组部，这次换了说法：

“王实味到台湾去了。”

刘莹想，在全国解放以后，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做地下工作，他这是将功折罪呀！组织上还是信任他的。直到一九七八年，已经下放到吉林省蛟河县，并且已经退休了的刘莹在广播里突然听到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那一段话：

“……王实味……暗藏的探子……抓起来……杀了……”

她呆住了。手脚冰冷、浑身发颤。儿子女儿忙将她扶住，阖家抱头痛哭。他们其实早几年已经略晓真情，却一直瞒着年迈的母亲，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只希望妈妈有一个安静的晚年。

一九二六年就参加了党的刘莹可不这么想。她太了解自己毫无遮拦的丈夫了：王实味会发脾气、会骂街、会讲过头话，但不会去当特务，不会是托派，更不会反党，绝对不会！一九七九年，这位几乎连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的七十三岁的老人，三十年来第一次南行。她不是回家、回她那“山青水远，水绿无寒烟”的故乡，而是进北京，向党申诉。

又是七个年头过去了。真是“来之如猛虎、去之如抽丝”。他们——他们现在已不止母子三人，王实味已经有了女婿，有了儿媳，还有孙子和外孙——等着，既然已经等了五十年。

他们有不少亲朋在海外，开放之后，怀着说不清什么感情，频频给她们送钱送物，刘莹一概谢绝；他们于是说这是三十年代向老人借的，刘莹干脆断绝了往来。王实味幼时的好友在香港当记者，一再请刘莹“把味哥的像片、材料和你的申诉都给我，我在这里发表”。刘莹不给，她说：

“这是我们党里的事情。陷害实味的是过去的党，现在问

题一定能解决。”

留在她手上的丈夫的照片，只有这小小的一帧。动乱的十年间，她把什么都烧了，这最后的一张实在舍不得，只好剪小、再剪小，藏在女儿小时候像片背后。

她今年八十岁，正随着也是当教师的儿子住在湖北省那座著名的汽车城。她觉得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尽，只是静静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在那一天，她将用她那双保管过机密、撒过传单、写过申诉、并且与李芬亲热地拉过的手，亲自为昭雪的丈夫奠上一杯薄酒。

附：文中提到的一些人物简介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凯丰，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张如心（1908——1976）著名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东北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央高级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

柯柏年（1904——1985）老一辈马列著作翻译家，建国后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主席。

何锡麟（1914—— ）马列著作翻译家，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编译局顾问。

李言（ ——1984）建国后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常务副所长、党委书记，曾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温济泽（1915—— ）原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殷白（1918——）原名张惊秋，现代作家。

荣孟源（1913——1985）著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金紫光（1917——）现代剧作家、音乐家，建国后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刘雪苇（1912——）文艺理论家，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顾问。

郑超麟（1900——）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托派，“无产者社”成员，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王独清（1898——1940）文学家，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创造社理事，主编《创造月刊》，后成为托派，被清除出创造社。

陈清晨（——1937）原名陈其昌，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托派，“无产者社”成员。

王凡西 即王文元，托派分子，“十月社”成员。

（中央党校图书馆雍桂良提供）

参 考 文 献

- ①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90年代月刊》1985·5）
- ②王学文：《我的回忆》
- ③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 ④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 ⑤参见《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2·1版）
- ⑥温济泽：《斗争日记》（延安《解放日报》1942·6·28，4版）
- ⑦佟冬：《漫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同上）
- ⑧郭靖 聂耶：《在国际问题研究室的两年》（同上）
- ⑨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4）
- 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
- ⑪王震：《满腔热情地对待人民事业》（1987·5·23《人民日报》）
- ⑫舒群：《毛泽东故事》
- ⑬高阜 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 ⑭杨尚昆：《托派王实味的活动与党内自由主义》

附 录

为《王实味和〈野百合花〉》 一文补正

刘雪苇谈话片记

· 唐天然 ·

戴晴同志的《王实味和〈野百合花〉》发表以后，引起了社会上对王实味沉案的多方关注，影响颇广。刘雪苇同志是作者走访过的。日前，我有事拜访了雪苇老。谈话中，提到了这篇文章。雪苇同志觉得，王实味事件的大致轮廓，如戴文所写。但有几点需要补充和订正。

戴文写道，王实味和刘雪苇争论时，曾经宣扬托派观点。后来，刘雪苇“无意间向徐健生提起”了。雪苇同志说，那时候，他是把和王实味争论的情况，正式告诉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长徐健生和党委书记李言的，并不是“无意的提起”。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在当时并不奇怪。只要了解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延安的政治气氛，和刚刚开始整党的前奏——“忠诚坦白”运动，就会明白的。雪苇同志严肃地表示：“我在这一事件上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承担的。”雪苇同志的这番话语，使我感到一个老同志的坦荡胸怀。他直面事实，毫不透过，其勇气和精神很值得钦佩。

雪苇同志还说，后来他奉命在中央研究院全院大会上发

言，揭发王实味散布的托派观点。对于这件事，他同样也有责任。他的揭发，可以说，对当时批判王实味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尔后发生的情况，确实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他一开始也没有把王实味的那些言论当成什么大事，以为只是思想问题。而后来，院领导把王实味的问题毫无根据地升级，定为敌人——托派特务。对此，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并且在支部（研究室）会上发言表示，上升为政治组织问题还证据不足。从此对王的院外斗争会和缺席批判会等等，他就没有参加。当然，他也没有公开和主持斗争的罗迈同志争论。

雪苇同志说，戴在叙述他和王实味关于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问题）争论这一情况中，有一点需作原则的更正。他说，王实味同意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可能产生、存在，而只能有“无阶级文学”，不能有“无产阶级文学”时，他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戴文说他在反驳中，曾“强调文艺为阶级的政治观点服务”，这是没有的。雪苇说，他在一九三六年的上海，就曾撰文批判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刊《现实月刊》）。而他和王实味争论时，只是在王同意的托洛茨基《文化与革命》观点的范围，即表明无产阶级文学能够成立，并已经成立（如高尔基的作品），并没有涉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而且，当时延安提出“文艺应为政治服务”的命题才刚开始，“为政治观点服务”，尚没有这种说法。

戴文提到，洛甫同志曾让刘雪苇去和王实味“接触”，说王有根多见解，可以“听听他的看法，取得他的帮助”。雪苇同志说，他那时刚到中央研究院，还住在文抗。洛甫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人可以来往，互

相交换交换意见。”告诉他那人是王实味。雪苇说，戴文说得有点重了。

雪苇同志还说，中央研究院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整个过程，直到社会部把他逮捕为止，都是在罗迈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罗迈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干部教育部部长。他是受毛泽东同志之命来管中央研究院的党组织的。在处理王实味的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诚然负有责任，但是，罗迈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给王实味进行平反的问题表现了积极的态度。这在戴晴同志的文章中已经写到。刘雪苇同志说，罗迈同志主动作了反省，认为造成王实味问题的原因和自己有关。在临终以前，一再提出要对王实味进行平反。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有勇气的。

戴文的第七节中写到，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一九四五年曾经就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中的成全、王里二人的问题说过：“是黑夜里的白刃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刘雪苇说，不仅如此，整风“甄别”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初，毛泽东同志还曾把成全、王里请到自己的窑洞里作客。表示是弄错了，亲自向他们道歉。这在当时是一个震动延安的消息。王里是王昆仑的侄女，那样做有为了向王昆仑搞统战的意思。潘芳夫妇后来也解放出来在社会部工作。当时，人们还以为王实味很快也会宣布无罪释放的，结果并不如此。他没有被解放，还关在社会部，以后反倒处决了。

雪苇同志最后说，现在重要的是需要召开一个会议，对王实味的政治问题公开平反。

储安平与“党天下”

【帽子】(mào·zi) 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用品：一顶～。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字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2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1959

—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标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0018，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耍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

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已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二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阵营，从50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囿囿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

^①：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在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当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

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下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置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1950年 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月	镇压反革命
1951年 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 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 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
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鲶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她是斗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

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盅、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曰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象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面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弗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帖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提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时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

《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

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50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1956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闹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年，记者们还没有存、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的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

出的话语：

鄙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①。这种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她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象雷锋、象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

^①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

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史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 大事记和文件汇

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礼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复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们的观望不前适成对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到1957年初的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狴，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护党面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

唯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

真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易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而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9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

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已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入“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末，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

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阴谋”开始了。

三

【个人英雄主义】 gè rén yīng xióng zhǔ yì 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好出风头、逞能干。不肯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企图在革命事业中把自己造成“英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甚至损害革命和集体利益。

——《现代汉语辞典》

1909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

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象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

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上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行二，分家时得了300多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作不下去，人也作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即又出走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着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17~19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200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份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象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在他数十万字的遗文中，

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都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留学成了他日夜萦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学，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观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今天，35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60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英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

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不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21岁，而22、23、24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30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这篇序写于10月，11月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遇难恰在那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致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

——虽然他们的名字自57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10万字的书，居然完成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对英国式的公道(fairplay)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亲情之爱，这在后而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s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无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

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第二代新月派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过得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60~80元一个月，他则拿到120元。25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夫球，客厅可招待7、8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学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

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sy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须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善卷洞、张公洞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2000元官费——这就是在1957年屡屡被提到的“和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

会一结束，他就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储安平27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终身”。他没有组党，参加党派的时间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1928到1948，还是1949到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19岁到57岁的40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份：哲学家、律师、记者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4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份，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

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4镑，合当时国币约为65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21镑。”他如何节衣缩食呢——“那时，因脚爪之价格较猪肉为廉，几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sy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3岁，一个1岁，丢给了外祖母与祖母。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1957年，“章罗联盟”说提出，在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1937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3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还是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

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覬覦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掉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不能说他在那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到1948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不愿厕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不少光华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1941年。储安平那年32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3年之后，在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Lusy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面的赏识。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10

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1957年批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言。尽管这样，令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子弹而靠理性与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他正以参政员的身份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他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

是一份闲差，储安平却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色霁心平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象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OBSERVER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1946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四

“《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曾经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底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

——摘自《光明日报》第三届总编辑1957年对本文男主角（第四届总编辑）的批判

1948年11月24日。

那天，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黄伯韬兵团遭全歼，黄本人被击毙，解放军总部正向在宿县西南的黄维兵团的将军、军官与士兵们喊话，

那天，翁文灏内阁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两天后的解散已在预料之中。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那天，《观察》社内乱作一团。就在前一天，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发表了内政部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人人都知道，这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主编储安平此时不在观察社。不仅此刻，他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在社里露面了。但他最密切的助手林元与雷柏龄都知遭他还在上海，并没有随着一批批左翼文化人避到香港。他们经常接到他打来的业务指示电话，今天从这里、明天从那里。只有他找他们，他们找不到他。24日那天，他们知道他不会打电话过来了，

因为他为编辑事务，已潜入北平，而这座文化名城随即被解放军匝匝围住。

那天，是《观察》发行五卷十八期的日子。从1946年创刊起，在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已经发行了113期，印数从400份上升到10万零500份——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可真算得上一个奇迹。他们深知刚才提到过的那家夜报不会谎报军情，因为早在半年前，《观察》就已经处在一月一查的黄牌警示下。用今天的标准看，当年的中央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是相当稀松的。具体到《观察》，虽然几乎每期都发出不利国府的激烈言论，但真正惹乱子的，却是一篇接一篇要么远在中央社之先，要么与中央社唱反调的“观察特约军事记者”的前线通讯：“昌潍失守鲁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这批特约军事记者是谁，他们怎么会有本领搞到这又快又准的军事情报的？他们当中有没有共党？储安平又是怎么和他们联络上的？随着储安平离世，或许已成为千古之谜。确切留在世间的，只有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委员长的一句话：“娘希匹，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

24日那天，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和读者的安全，再加上读者的经济利益不可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电告本埠的分销户直接到印刷所去提取刊物。同时，提前将外埠的分销户和直接定户的刊物付邮。笔者曾反复调查，当时有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这事，员工们那时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和诸位常听到的故事相反，当时没人号召、没人约束，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批人可算傻到了家：老板不在，没有人会

为他们加工钱，闹不好还会把命送掉。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的只有一点——职业道德，一种中国报人的传统、一种自新闻出版业出现以来就一代代传下来的敬业精神。直到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主办的《青年论坛》被勒令停刊时，年轻的社长和编辑们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就是他们前辈同人的翻版——虽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世间曾有过一种叫做《观察》的刊物。

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以交火车运南京，三名公差闯入，自称受警察局、社会局、警备司令部派遣，执行“勒令永久停刊”命令。勒令全文如下：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依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伤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联想到《观察》后来被批判为“蒋介石集团的帮凶、反共反苏急先锋”，与此勒令对照一下，实在是滑稽的。

雷柏龄签字收文，然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对读者有个交待——《青年论坛》也曾作过这样的请求；另一家也是1987年被封的湖北画报干脆问都不问就这样干了。在这一期上，他们郑重登出所有撰稿人的小传，一口气读下去，好不悲壮。

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笑了：“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究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

出来！”

在这里要对今天的读者作一个交待的是，《观察》的署名办法，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今天我们熟悉的是，消息与通讯的记者个个署名、署真名，若是位置与字号署得不够意思，还要计较一番。但事关重大的代表一张报纸倾向的专论与言论，只署“本报评论员”，某些享有特权、专门在各报发表言论的班子，则署些一望而知是编出来的梁效、罗思鼎之类化名；若言论的作者觉得奉命之作违心违得厉害，有时也临时凑个“姜伯铭”（讲不明）之类，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会在大块、重头的政论文前署真名，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这是有着特别道理的，后边还要谈到。

《观察》恰恰相反。对于专论，它在发刊词里就已言明：

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实姓名的任何论文

只看下边这几篇署名政论文——它们是《观察》中最常见的——不是颇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么：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吴世昌
论官吏的民权	楼邦彦
论政府大捕学生	赵超构
政治力量安能稳定物价	严仁赓
评最近官方抢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施复亮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笄移今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储安平
至于记者，	

《观察》特约记者的姓名，“储先生是素来不告

诉任何人的。所以我们即使在社服务多时的同人，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究竟是些什么人，都弄不清楚。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我们也从来不问储先生。”（林元语）

但官方是一定要找到这个泄密的家伙的，案子后来的发展于是就象一部惊险小说了：特务们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一会儿在楼邦彦家、一会儿在费青家。他所指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北平的特务还不放心，因为依照户籍册，城里共有3个徐盈，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造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总之，险象叠起，不必虚构，即可进入惊险小说。这案又拖了四个月，上海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真正的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直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那天。至于那位重犯“南京军事特约记者”则在林、雷二位的拚死保护下待机会溜出上海。他连夜逃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才回来。在“晴朗的天空下”，他笑嘻嘻地向林元道谢，并送他一把保险剃须刀。“另一把是送给小周的！”他笑着，拍着口袋。“哪个小周？”林元问他。“周恩来呀！”他说。

遗憾的是，这段故事，《观察》社的人一直没机会讲。红旗下长大的如笔者辈，于是只知道井冈山会师，只知道延安大生产，只知道打了绑腿的士兵睡在南京路上——拒腐蚀，永不沾。

这段历史再度与读者见面时，已换了说法。那是1957年，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在他的批判中抛出了这么一段：

这位主编(指储安平)在1948年8月的报告书中还说，“在最近半年，政府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1)(惊叹号为批判作者加，下同)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1)，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呵！真是多么够瞧的。政府多么够有“宽容”精神了！从1947年5月开始，为了这个“可怕”的刊物，到1948年8月以前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不止一次讨论过它，可是一直到1948年12月，一直到上海危在旦夕之前，在“南京中枢”准备逃跑之前，又是这位主编远赴北京后才查封的。——这真是凑巧极了，也就这样使《观察》维持了“完整的人格”！储安平的生命也庆幸保存下来了！

他于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观察》到底是“第三条道路”的文艺刊物，还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某一核心组织的机关报，倒是很值得分析和考查一番的。

这实在够吓人的。幸好那时是1957而非1966，这种思路尚未全民普及，否则储安平后来就不可能有在宅中养羊之举而要坐大牢了。

那么，《观察》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呢？

先看发刊词。虽然一个人的宣言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但这篇储安平亲拟的卷首语就是今天读起来还能感到它的冲击力——不仅对旧营垒，还对了荼毒中国人的旧传统与旧文化。读到这里，恐怕不少读者准备着逃跑了，因为近年来向

旧传统旧文化冲击的文章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大和那么空，真让人吃不消。还好储氏的文章恰恰与之相反，它是太切实了，实得如同今天的读者几乎都有感同身受之错觉：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虑；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面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屑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

遽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末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有志之士如何挺身而出呢，从军？从商？从政？从事高尚纯粹的文艺活动？储安平选的是一条既使用或者说特别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但吃力不讨好，且荆棘丛生的路。俗话说就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而都

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对于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储安平提出八个字：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着英国式的立宪精神。他认为：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对于自由，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叙述是很带了一点感情的，至于将自由与人格这两概念联在一起，起码对唱惯了“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须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接下去的“进步”论述一般。或许“进步”本身含义太泛，不具太强的抗争特色，谁都可以高高兴兴甚至加着码接受。学校里派进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员可称作进步；大跃进、超英赶美也可称作进步。

第四点，理性。应该说这点最具储氏思想特色。也许汉学家们会觉得奇怪，受英国教育的报人，居然要在“道也者，不可离之须臾”的文明古国呼唤理性。如果汉学家们除了读《易经》也读《人民日报》，碰巧还作一点社会调查，他或许还记得，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判断一件事一个人是不是大恶，常以“俺们贫下中农(是否)气炸了肺”为标准；时至今日，也常以“××同志很不高兴”来臧否事物(这里的××同志一定得是××而不是×××，如展堂同志、精卫同志，否则就不大象大家敬爱的最高决策中人了)。且看储氏的论述：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和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

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在1957年特别遭到批判的，是这篇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话：

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这样的办刊旨趣，如今是日渐其少了。我们所熟悉的别样的宣言——虽然刊物就性质而言，与观察周刊显然有颇多相似之处：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讴歌各条战线正在风起云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由衷地赞颂我们党和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开创的日新月异的新局面。……成为向四化进军的航船上一个新建的小小的观察哨，并与早已工作的千百个兄弟观察哨一起，在浩瀚无垠的生活的海洋中，为党和人民进行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瞭望。……“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们就是要为在党的指引下进行战斗的人民击鼓，我们就是要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欢呼。

应该说，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就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精神也不大吻合。现在不能确知毛泽东是否读过《观察》，但只看他在1943年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的批评，即可知储安平的这一套是不可能对他的心思的。毛泽东批评彭“谈民主从定义出发强调反封建，而没有从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抗日”；他批评

彭“确立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而没有着重为着发动人民积极性”；对于“集会结社自由”，彭也搞错了，按毛的意见，不应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有利文化科学发展，而应是争取斗争的胜利”……

不过毛泽东谋略式的原则当时并不为一大批民主人士所知，也管不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储安平仍得以大模大样地贯彻他的“四个坚持”。

紧接着发刊词，署名打头阵的，是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今天，恐怕没有人署名在报上发表“时局之我见”之类的东西了。对时局走向的讨论，一般只在两处进行：要么由有血亲关系的老老少少在饭桌上瞎胡聊；要么高层人物在极机密的会上商讨。其余的人，包括大、小报编辑，学者、各机关首长，都眼巴巴地等着，任何创新都不敢有，一件非重复性的事都不能干，生怕“精神”一旦下来，闹个满拧。

但王芸生那时是不会有这种顾虑的。在1946年的秋天，他将时局走向归为三个要点：

1. “南北朝”。他并且指出，这是中共要达到的；
2. “十月革命”。他认为中共那时未必有这么大的野心和力量。他以为此种局面的出现必是国民党军队哗变的结果；
3. “政协之路”。他认为要害是改组政府，举行民主大选，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上。他断言，这是“中国时局前景最好的一个去向”。

历史已经证明，王总主笔的估计全错了。

半年之后，储安平自己出来谈政局了。那时，《观察》已

从400份(试刊)跃为正式发行的8000份。本来,按需求,10000份也打不住。对此,储安平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只印8000份,这是他的生意经——让市面觉着抢手。

这篇题为《中国的政局》的文章,1957年曾专门被提出来示众,不是在批判会,而是在大报的正版上。应该说,标题虽是“政局”,实质上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与评价,开首即讲在朝的国民党: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接着历陈现政权实已毕露的“穷形极相”。他认为: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

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他认为改组政府固然是一种努力，但更重要的在于改革政治：“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

接下去，他开始分析第一大反对党共产党。读者或许不会忽略，他这是在国统区里，对政府正在清剿的“匪”（当时蒋委员长已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加以评议。如此立论，不必说在1947年，就是在1930年和1970年，也属罕见：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就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

对于周恩来氏之“往返于南京、上海、延安之间并参加国大起草宪法”，他认为：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者，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下边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

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

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史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史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勱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

“无”的问题了。

讲到民主党派，特别是不带一点虚饰地评介列位或名人、或同道时，其率直与百无禁忌，即使今天不大知就里的晚辈读者读起来，怕也会不禁莞尔：

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连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象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

人物中实际治政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

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连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连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谜：为什么曾屈辱地顶着“尾巴”之称的民盟，会在1957年乃至1987年都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因为即使只用共产党一家的标准来衡量，也绝不能说他们的态度是最坏的，比如史良前主席之所为。可能有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太大也太活跃了一点，而这一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是具不同的价值的。

在文章的最后，他谈到自身。对于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即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且颇为鄙视地与美帝扯在一起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作了 he 独有的分析与估判：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自由思想分子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认为：

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

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

联想到1957年这批“自由思想分子”竞相表态，竞相揭发的场面，储安平会对他上面的这段议论难过的。他还认为：

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它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 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了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

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那还管什么是非呢？

至于这一特殊成份对中国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储安平给出的是一书生气十足的结论，也是1957年受到抨击最多之处：

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取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在结尾处，储安平表现出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郁悃中的

顽强——他并不乐观，储安平天生就不是那种憨敦快乐的人。但他不沮丧，不放弃努力，怀着一种不是出于利害而是出于认知与领悟的使命感，将辗转挣扎、苦苦撑持视为当然。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品性，差不多终其一生。该文的这一结尾，则几成讖语：

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2周以后，在1947年2月22日的一期上，梁漱溟以他那独有的即使有99%同意也要把那1%弄个一清二楚的脾气，写来了不同意见。《观察》历来极吝于版面，除头条文章的首页用5号字通栏排出，第二页与第二条即改为两栏，到了第三、四条，已变为新5号字三栏，至于不署名记者写的通讯，一概为6号字七栏——因为连续阅读这种排得密密麻麻的文字，笔者本人三日之内即患了爆发火眼兼偏头痛——对这提出针锋相对意见的一文：

尊作拜读，其中大半可以同意，但尊见与事实不符者亦不少。尊作有涉及漱溟之一句话，也要在此声明否认……

储安平居然用老5号字加框通排。这种殊荣，就《观察》

而言，是绝无仅有的。而对于无数来自读者的颂扬文字，仅偶然挑选其中含有建设性意见的，用7号字登在刊尾，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风格。

《观察》初创时，储安平曾对笄移今（他是该刊最大的股东，一人即认48股，林元26股，徐盈19股，马寅初、梁实秋、钱钟书、杨绛等都是2股，储安平本人仅1股）说过：“办刊物若想成功，紧要关头要站得起来。”这条行事准则，与今天的“紧要关头要稳得住劲”显然相悖。联想到储安平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仅70天就做不下去了，或许可以理解为，当头上飘着的旗帜变了，他在准则上竟无丝毫应变能力，显得多么书生气。

而在当年，他对此确是信守不渝的。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一案。查封的罪名完全是政治性的：

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

……

着令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三家报纸与《观察》有什么关系么？用储安平本人的话说，“其中一份不常看”，至于另外两份，

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份量的文字。这样的报，由它封掉好了，与《观察》何干？但储安平信

守“站起来”的原则，他出来呼不平了：

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我们站在同业的立场，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

这样明白的表态，在当时报界已属罕见，储安平仍觉不足，为了信守他的“原则”，竟然犯了直到今天报界还认为是决不可为之的大忌——除非上方宝剑在手（或在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同行，并且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公报》。先翻学潮报道的老账：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象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

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在这儿指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也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决不至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由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看到这里，今天的读者，特别是30岁以下的读者和报界中人也许会问，储先生是不是得过三报的什么好处，欠若人家的情哪。至于跟大公报，没准有点过节，这下子可逮着了机会。

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也不能不出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在大公报编辑标准中，大概象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

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4日，大公报对此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边，仅和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①。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

^①这里指的是1946年《观察》初刊时，储安平以主编身份向包括卞之琳、吴世昌、李育纯、宗白华、胡适、马寅初、曹四、梁实秋、傅斯年、钱歌川、杨绛等在内的58名学界精英发信，请求应允作《观察》的特聘撰稿人，无论本期有稿与否，都将其名字印在封面上。为避免精英们因怕麻烦而不复信，储安平将“同意担当”的回信预先打好，回信信封也写好并贴足了邮资，精英若同意，只签上名字即可。发出的信只有徐铸成一人未复。照上文看，储安平可能又追发了一封，依旧未复。

1988年，笔者就此节向提请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2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

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无暇顾及一己的凶吉安危了。

类似这样的话，“今日之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寄托在我们肩上”云云，对当前办刊人而言恐怕是很遥远的了。文人们最习惯的是做喉舌，若做得不够安份，最常听到训词是：中央还没定下的事，要你多嘴！

储安平却是很多嘴的，而且不以轻饶个把县长或者司局长为然。他要么不出言，言既出，就是要害。比如军人从政。中国历来的逻辑，哪里有老子打了天下而让别人去坐的道理？！《观察》于是刊文，介绍“黄埔将领中出任省主席的第一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任吉林省主席的梁华盛，直指他如何在“一介武夫，不懂政治”的谦词下，“将一省视为自己囊中之物，将民众视为沐浴恩泽的子民”，说他“除了享乐方面尚且在行（如买汽车、修温水游泳池）”之外，经济、文化等均放胆瞎指挥。文章最后呼吁：假如中国不能进步到民选省主席，至少希望中央不要再把军人放在行政官的位子上。

这不过属于小气候政治。对于经济问题，正当政府发布“黄金紧急措施方案”，想将日前高价抛出的黄金平价买进时，

马寅初又跳了出来。他不会不记得他被监禁的两年和软禁的两年，但这位在台上直斥财政部长孔祥熙，并为四大家族算出17亿家产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又公开出来就最要害的问题唱对台戏，告诫普通百姓：“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而《观察》也原文照登。

马寅初疾呼：“黄金倘使真集中在政府手里也就算了，倘使一转、二转，转到私人手里，又何必？现在中国的情形，黄金已经集中在几个人手中了^①，多数人手里的少量黄金不必再送给他们。”“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就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而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果另有好的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小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也不算晚。”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马老了。其实，1958年之后，就已经不再有他了——虽然他顽强地活过了百岁，只为让讨厌他的人多点不舒服。对于今天政府出台的各种金融措施，小百姓只有发呆的份。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袋不够鼓，也只有认瘪的份。今天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出来为大众解释一下低工资与高等级福利的奥秘，没有谁愿意象马寅初一样不去当财政次长而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黑白灰三种外币市场，为什么会有国库券、外币兑换券，为什么金价会奇高（卖出）又奇低（买进）。当然，就算有了密室里的、甚至讲坛上的马寅初，也没有《观察》了。

^①：当时政府已穷得无外汇供科学家出国参加会议、无外汇供学生出国留学，但宋子文的三位小姐余在美国养大，大学已届毕业，尚不会讲中文。

考察一下《观察》的封面，实在是很有趣的。它非常简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封面，更不必说五套色或者七套色的封面女郎——《观察》用不着靠她们招徕。它的封面本身就是目录页，作为刊物支柱的48名撰稿人的名字，期期保留。在封面的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者为图形的刊徽，四周书以英文 THE OBSERVER（观察）和 INDEPENDENT NON PARTY（独立的、非党派的），在首页头条文章的上端，再次打出带纹饰的刊名，标出该期撰稿人的学术身份和“储安平主编”五个2号字。

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刊，当然届时已有若干改变——这是后话。

储安平办刊的招式层出不穷，但有几条是信守的，曰“一要人抬刊物（比如这48位特聘精英），二要刊物抬人（比如漫画家方成，就是在《观察》的提携下从无名青年一步变为专栏画家的）”；曰“我要办得人们以在本刊上发文为荣”。为此，他对文章把关甚严。一次，马寅初转来他的一名身为立法委员的学生的稿。储安平自己觉得不大行，为慎重起见，又拿去问金融专家笪移今，笪也觉得差了点。储安平把稿退了。为此，马老发了不小的脾气，连连骂道：“看不起我，把我的撰稿人从封面上拿下来好了！”当然最后稿也未用、名也未拿。

1947年3月，一场剧坛上的争论，在《观察》上摆开。先是李健吾的一部戏《女人与和平》在辣斐上演之后，被许多人恭维，很热闹了一下，接着曰木写文章批评。这批评，用剧作者的话说，“把洪深先生和许多好心好意的朋友都骂在里面了……是我要他们那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作品。我告诉朋友们说，辣斐冷了许多，为重新争取营业、冲破难关起

见，希望随便写几个字在报上凑凑热闹。”应该说，这招认是很诚恳的，楼适夷的反驳纯正而犀利：

……朋友们所以捧场的原因，只不过想多骗几个观众，给辣斐热热场子，并不是作品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作者不借作品本身来争取观众，而必须借助于庸劣的商业广告已经太可怜了，而更可怜的是那许多捧场的朋友，他们的时间、精力，他们对于读者与观众的信用和责任。我亲遇到过一位写过捧场文字的朋友，自述其被拉而不得不应酬的苦衷，而那本戏的本身，他是看不到一半就溜走了的，这种小心得不敢得罪一个朋友而大胆得罪千万读者和观众的“圈内”人，我想今后是应该考虑考虑了。……今天的话剧所以搅得那么悲惨，那种死拉观众的营业路线是应该负责任的。象李先生之流的话剧运动者，眼睛死死盯着上座的场子，完全放弃艺术路线，纯正的、艺术的、优美的作品不敢搬上舞台，而明星和噱头又搞不过姚水娟和大世界，进步与落后的双方观众都拉不住，这就是话剧剧院闹得如此冰冷的真原因。即使《女人与和平》赚了钱，辣斐还清了债，然而纯正的、承受了进步传统的新话剧又何在呢？

在1957年对储的批判中，屡屡提到他的“反共面目”、“坚决反共”的行为。这就很难解释上面的一组剧批文章了。因为，按一般观点，李健吾是属于自由派中间分子，而楼适夷不但是立场鲜明的左派，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储安平当时的共党朋友不算少：徐盈、杨刚、顾诘刚等。

当然身居要职的国民党朋友也很多：沈昌焕、李惟果……。笄移今是储安平最密切的伙伴了，在他逃亡期间还是最后几期的主持人，但笄从未向储谈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储是否知道，哪怕仅仅猜到了？二人之间从未挑明过。

那么，储安平编《观察》时与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1948年11月，《观察》发表了一篇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那时，《评战犯求和》虽然尚未发表，但“歼敌30万”的辽沈战役已经打完，“歼敌55万”的淮海战役已在布置之中。毛泽东那著名的“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论断不日即将作出，而蒋介石的引退与“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正被认为是一项阴谋。“和平”已成为“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一切，想来无论储安平还是张申府可能知道的都不甚确切；或者说，这一切都是后人的评价，当时是不可能如此明晰的思路的。总之，《呼吁和平》上了48年11月那一期的头条：

今日呼吁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乱或百年勘乱的道理。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计，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使人民得喘一口气？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而，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未必智的冒险。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地替蒋介石帮忙。文章一出现，共产

党员施复亮立刻通过笄移今找到储安平，请他到红棉酒家吃工作餐。据笄移今回忆，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施复亮的意见，什么都没有说，只在下一期的头条，登了施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当局的文章。《观察》从此再不言和平，尽管当时类似的呼声（或曰见解）在知识分子群中是相当普遍的。

说到这里，对《观察》的介绍还不及什一。读者或许可以隐隐感到，刊物办到这个份上，有志于此者是很难不上瘾的。这似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储安平没有在解放前夕随大批进步文化人避祸香港的道理。因为他当时的确足够进步，处境也足够危险，而且香港方面也确实派了著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刘清扬（施夫人）到处找他。笔者开初倾向于认为储安平的城府过深，他不打算与任何党派交往过密，更不愿欠谁的情，以保持自身最宝贵的独立。现在看来这可能是过虑了。他只是简单地舍不得他的刊物，如此而已。既然有好几万理解你，支持你，渴望听到你的声音的人在连买米都需东拼西凑的时候还买你的刊物，岂有忍心抛下他们一走了之之理？他坚持着，直到本章开头讲的那“查封”事件发生。

这是他生命的峰巅，此后他再也未能比这攀得更高。对此，他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甚至至死都不这样认为。

这是无法争辩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人的沉浮线，通常总是由后人而非当世人所能绘出。当世人是看不到那只有后人才能指出的冷峻的现实的：他已失了优势——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随意发宏论，却还存着劲头；办一份人人瞩目的精英刊物，无论局面怎么恶劣。他当时显然不认为会有比那时更恶劣的局面了；通讯断绝、交通断绝，米价已在--周内涨了十多倍。

这是颇带几分傻气的。其实，这种傻气，若缀以堂堂皇皇的收尾，哪怕只如阿Q般带着几分滑稽的凄凉的收尾，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什么都没了，感受没了、激情没了、热辣辣的快乐与活泼泼的仇恨也没了；没了倾心相爱、没了暴跳如雷，连临死前的嘶叫也没了……你被闷住了，被平庸、被废话、被种种不知包藏着什么的腻歪，而且完全在不知不觉中。

辉煌从此不要再想。只剩下聊胜于无的追求。
不过，还应该有什么追求（或曰蹦跶）么？

五

【勉强】①谓力不足心不愿强而行之也。《礼·中庸》：或~而行之。《汉书·严彭祖传》：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云贵人左右之助，经意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彭祖性廉直，不事权贵，此所云勉强，盖欲其曲意交结贵人也。又日语谓勤学为勉强，即勉力之义。日本商店称格外克己亦曰勉强，则为曲意俯就顾客之意。②犹怂恿也。《汉书·卫山王传》：日夜纵史王谋反事。纵史犹言勉强也。

——《辞海·1936年版》

储安平没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京迎接解放的。
那时，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跃，民盟总部（工作委

员会) 3月5日就迁到北平了,比中共中央还早了20天。不少学术性团体已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大家都准备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

储安平在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党派,而且不入则已,一入就入了两个:九三学社与中国民主同盟。两边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称往来颇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边是许德珩许老;民盟是费孝通——今天也已是费老了。储安平当时虽然这样向袁翰青解释:“两边都请,不好意思,两边都参加吧。”私下里实在是很有点小小的得意的。

看来那时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对他们的唐突为意,不过后来储安平也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民盟人才济济,储安平在这里很难脱颖而出——不象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夫子。1959年戴了帽子之后,这两个党派倒都未将他除名。这一举措,造成今日仅余5名不予改正者全部为民盟盟员这一现实。

储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学胡同,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周恩来亲莅该旅舍,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安平不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人,此时却深为感动。他后来对袁翰青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而且谈得很高兴。”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称为高贵,总可称为自由的心灵,就这样一下子被俘获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周的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再一个就是,他们太高兴啦:在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屈辱和牺牲之后,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光明的局面终于盼来了!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自己的努

方乃至功劳^①！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这批民主人士心中的戒备、芥蒂，或许还包括他们独有的理想与判断力。满心欢喜的储安平这时显然忘了他对于“中共搞经济恐怕不行”的担忧，也不再顾虑他断言过的“自由的有无”。新政协就要开会啦！民主联合政府就要组建啦！新中国就要成立啦！

政协新闻界的代表共有14名，胡乔木打头，储安平名列其中。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结识了“乔木同志”。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50年代还是80年代，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虽然据称他们已相识多年、共同受过英美教育，甚至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人当然也有赏识他和愿意用他的时候，但当需要揭他、贬他，踩他，乃至在30年之后还不肯公开回忆他的时候，是很拉得下脸来的。恰如1953年，当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发生争执时，喊叫着不许梁再讲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主党派的朋友。

当时《观察》被封已有10个月。胡乔木、胡绳等在此期间曾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这一连串的举措，储安平想来是知道的。因为在7月间平沪两地交通恢复之后，他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读者此时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坚持完全民办、不受党派制约的原则，正在从思路到语言一步步适应新的社会风习。

到了1949年11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

^①：这一想法或许可以与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着枪进城的老共产党员干部（他可能不怎么识字，身上却有七、八处伤疤）的说法相对照，对于民主人士，他的评语是：“他们的功劳如一根毫毛，把他们拔去也如一撮毫毛！”

民政府刚刚选出这一重大时刻，《观察》在被查禁11个月之后正式复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储安平竟然没有想到请毛主席、周总理，哪怕九三的许老、民盟的沈老题个辞；首页的撰稿人身份介绍未变，刊标也还在，只是没有了周遭的英文THE OBSERVER与INDEPENDENT NON PARTY，虽然表明了不屑沾洋的气概，从形式美角度看，却秃秃的没了样子。加花饰的首页刊也还在，不过去掉了“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

最为有趣的是，复刊上来第一篇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这可不象储氏风格，不知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编当时是正吃了一点批评还是有什么人劝他顶好取这种姿态开场。他让步了，费边社信徒历来讲究妥协(COMPR OMISE)，这又很象他的风格。至于标题的措辞，虽然储安平一生对文辞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简直能把读者吓退的用语，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用得出。另一个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的变化是，这类天经地义应由主笔写的文章，署名却是“本刊同人”。这里看不出储安平对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修正，在这复刊词里，他的自责是不大着边际的——这或许正反映了他此时认识上的不着边际：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

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这篇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怀疑。比如文中有“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似不象储氏之所为。如果真是他写的，也只能用诸如“入乡随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语来开脱了。而对于这种陋习，如果连储安平一类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迹其间，致使18年后优美精致的汉语弄到只剩下“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

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4亿7千9百万中国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

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象是一次奇迹，
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接下来的是我们在文章首页上引的那段话：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还想在中国觅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

考察储安平的一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会作违心的捧场之语的。从上文可以看出的是，他，以及相当一批类似的先生们，在换上中山装的同时，差不多也换了一个头脑，一副心肠。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装并不是中共的创造，蒋总裁和党团系的人都着中山装。储安平们为什么不在彼时而到此时才换装呢？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储安平与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到8年后的“向党猖狂进攻”，再到17年后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景况已大不同。是他变了对方未变，还是对方变了他未变——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翻作当代政治用语：前者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将矛头指向我们一贯正确的党”；后者是“在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下，顽面分子拒绝改造”。可见在储安平的下半生所处的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对人的估评多么具有服务于形势的随意性。

在这篇复刊词里，储安平特别强调了工作方式的改变：

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各种编辑工作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对于文章的内

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这样的工作方式，真是难为他了。储安平一贯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刊物事无巨细，一概一抓到底。据林元回忆，“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观察》的鼎盛期，发行量已到25000份，外加一套《观察丛书》）编辑还只他一个人，我是唯一的助手。”储安平亲自定题、阅稿、复信、改定，直到终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连每周五清晨将版送往机场（周六全国同时见报），也是他亲自去。林元还记得他们二人深夜从印刷厂出来，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连只是一只而不是两只这种事，也由储安平亲自定。很难想象复刊后的集体主义工作方式是由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思想产品本无“集体”可言，这点安平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有什么主编就有什么刊物，主编的思想、趣味乃至习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思想、趣味、习性，本不言自明。强调集体，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性的一种堂皇的托辞，但若厚道一点，也不妨看作风气使然。不过话说回来，刊物办到今天，上面那番话也“可以体矣”！因为今日有幸与读者见面的任何铅字印刷品，全可铁定地认为是集体作品。虽然党曾一再教导“文责自负”，且几乎每个作者交稿时都把这一条绝望地强调再强调，稿子最终总难免被“集体”一番。比如诸位现在正读着的这篇文章，就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位置上的人“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集体”决定的结果。

复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队伍变了。试比较原《观察》第10期（1946.11.2）与复刊后的第10期（1950.3.6）的作者：

	原《观察》		复刊后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陈友松	北京大学教授	瞿宁武	南开大学研究生
韩培德	武汉大学教授	陈治文	南开大学
萧公权	前燕京大学教授	许 诚	不详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陈瘦竹	国立戏专理论 编剧组主任	郢端、白磬	不详
		田欣	南开大学学生
		肖玉之	东北银行工作
		李有文	大学讲师
		陈醒民	华大政治所所员
		黄开楫	同济大学学生

再看文章内容：复刊后的《观察》频频刊出诸如《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看齐》、《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劳动先锋马星祥谈50年大生产》、《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党内理论家胡绳开始给《观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观察》的风采又具新《观察》的精神：《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郭沫若的诗作也第一次出现在《观察》杂志上——《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

一部份老撰稿人依然活跃在复刊后的版面上，当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吴大琨教授提出，《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在吴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说，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调整等等都还没有发生，作者本人当然一时无法对“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作一界定。从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达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实际上的不足：

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过去乃至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并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我们的学习水平提高到这个阶段呢？能够肯定地对这问题作“是”的回答的朋友们，应当是更少的。

这一论断，从文章上看，不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经济学（如果有的话）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本人政治素质的判断上。当然，这一判断，用今天的观点看，是过于天真烂漫了：

毛泽东主席是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现实革命条件，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者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地把自己的学习水平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理由。

费孝通教授圆熟的风格在复刊后的《观察》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知

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结合在生产中”。但，“在意识上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赖以生产的本领是知识，是脑力劳动，有类于小生产的手艺工人”。由于这种“白领阶级”“缺乏集体主义”，虽然“基本上是被雇佣者，既然不易有集体力量来保障他们的职业，就只有顺从和谄媚雇主来免除失业的威胁”，虽属劳动阶级，但往往“出卖了阶级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反而站在剥削阶级的阵营里”。并且由于“受了个人主义的毒”，而“观念上不能彻底，不能有远见”……

可悲的是，这不是唯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的和最经常的撰稿人，费教授显然还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卖力尽管卖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点过于疲软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点过于甜腻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文格渐卑庸福近。

漫画此时也变了风格，虽然漫画主笔依然是方成。在一幅画中，读者可注意到马、列二人及党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绝对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闭着嘴的工人与张着嘴的干部前后的那巨人的脚印。从画上看，这穿皮鞋的人是从后边赶到前边去了，且个头极大，谁呢？不会是导师幽灵吧？幽灵连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脚印？

旧日《观察》的风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如在第8期上推出的一则“献刊购债”，就颇具储安平式的机巧：由《观察》献出200个“3月定户”，“把收到的刊费去购买公债，读者先生一方面帮助本社多购，一方面自己又订阅了刊物，公私两

利”。这一计划后来兑现了七、八成，可见《观察》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这已明显属于小打小闹了。

复刊后办了13期，不得不收刊了，当然用的不是这个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一篇短短的“改组声明”（1950年5月16日）：

《观察》社同人为了使自己的工作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决定将本刊加以彻底的改组。《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新观察》半月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内时事刊物，由新华书店出版，其内容如下……

这一行动35年后用《新观察》“自述”的口气说起来，已另是一番风采，在这自述中，储安平与原《观察》已不见一点痕迹：

1950年7月，我诞生了。一位历史学家和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象。……我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本身也在不停的变革之中。仅仅半年时间，历史学家走了，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新闻记者又走了。这时候，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女画家又将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为一本时事、政治、通讯报道和文学、艺术、生活的综合半月刊——“恬淡清新、图文并茂，上下古今、无所不谈”^①……

文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话说：

1950年以后，我就开始成为党中央宣传机关的

^①：这四句话出自乔木。

工作人员，到1960年调出为止，我所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当然属于黎澍的这一工作期之内。据林元回忆，当时政府待《观察》的老职工颇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体工作安排在新闻、出版系统，北京上海随便选。林元选择北上加入《新观察》。他清楚记得，黎澍曾通过储安平频频催他尽快成行。想来这时两位主编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筹备新刊。

但《新观察》的办刊方针与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储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经是黎澍要通过他一次次请储安平到社里来的局面了。储来得很勉强，到后来则根本不露面了。从他的爱刊如命外加上刚愎自用，到此时闭起眼睛、硬起心肠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这时已到1950年底。

他显然是带着与这位编过《文萃》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深深隔膜离开的。他不知道，而且他永远不会知道黎澍的见解了，

“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申报》办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报》；《观察》也非要换个名字收编，气量之狭小，无以复加。”

储安平随后即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他当时或许有重打鼓另开张再干它一番事业的心愿，因为不少人都记得他曾经提过的各色各样的建议。他甚至亲自蹲在总店的门市，打算过问书籍上架等事宜——这都是后来人们怀着对他的怜悯面当作笑话谈起的，可见当时就不曾被认真对待。他的努力象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全部吸收进去面无任何反响。

1952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也未见有什么特别的作为。34年后，一位他当年不曾见过的部属，湖南岳麓书店总编辑钟叔河再版了他的《英国采风录》（距初版已有40年）。钟叔河怀着一丝难于察觉的伤感写道：

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过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50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

据说为出这本书，钟叔河还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国当记者，并且跟储安平还很可以谈谈的老友萧乾的意见。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储把英国说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再版无疑将再一次误导青年。听了这番意见，钟叔河还是决定出。不幸的是这本前发行局长的书只印到3000册（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国的好书大多是这种命运），连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学生都没有见到，足见几十年了，中国的发行工作依旧令人莫名其妙。

到了1953年，“上边”曾对前边讲过的收编行为有了一点反省，有意成立“新观察社”，由储安平任社长，戈扬任总编辑。不料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体工作人员的反对，其中以与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为激烈。他们是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呆在非党人士的“麾下”？要么就是储安平那种自己不要命连带别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让人受不了？再就是他的不知怀柔，用今天的术语说是不懂“感情投资”着实伤了一批人的心。其实储安平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没有悟到这也可以当作“本”来赚取利润而已。作过《观察》南京通讯员的冯覃燕至今记得1949年他结婚时，突然接到一封北平米信的情景。“那

是正在流亡的储先生写来的，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储抱歉说无法来参加婚礼了，只好简单地写封信祝贺。”50年代初，也就是储安平在发行局长任上的时候，冯覃燕到北京求职，“储先生到车站接我，那时每位局长配备一部三轮车，车夫兼勤务员。接到之后，储先生让我坐车先回他家，自己说了一声‘还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年，他开始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此行看来并非出于乔木单独的决定，而是与安平本人充分商议的结果。读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储安平对新疆和新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在伊犁骚乱前后长篇连载一位不知名的投稿者的长篇目击报道，又不顾别人的反对，出版《观察》新疆专号。他一定渴望亲眼看看新疆，特别当这片广袤与强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储安平在有事可作的时候总是精神十足。《新观察》总编辑戈扬清楚记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他上飞机的情景。为这次采访，专门给他配了一部车和一名助手，储安平对此相当满意。他的报道一篇篇发回来，在《新观察》、也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接着还出了单行本。然而，除了“乔木同志感到很满意”之外，这批费时费力不小的通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人们当时就没太注意，到今天差不多已经忘干净了。这情形不知储安平本人有没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着，把孩子们丢下无人照料。

就在这一片匆忙之中，1956年来到了。

和1976年一样，1956年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私有制在中国被消灭；至今还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了。

六

【谋】móu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②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年版》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①，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

①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采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①，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

^①：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角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 Laschi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①，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

^①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着讲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先是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

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

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们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部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

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入襁、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

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遭，“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面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

“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实在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①。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

^①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侍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提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李维汉作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与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与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报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

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如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采”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 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 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 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 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①（陈铭枢）；
5. 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 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 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 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 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 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 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 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

^①“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 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 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已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

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想不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持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 Very good! 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

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李维汉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2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竟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

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

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份。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

^①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

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面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

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搞出卢郁文^①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角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

^①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漫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

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这名曾以他的谋略令一批又一批中国精英人物倾倒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领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而言，都可

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

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象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蹂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 Jiva 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踱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

炽热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见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

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汨汨淌过。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而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角，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象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①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②。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而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③。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揣架子，似乎在努力

^①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②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璧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璧记得1950—1950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份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

^③一般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扣门”。据此节看，他的“扣”，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囤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癫痫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换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象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

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抱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所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面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

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

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象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

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索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

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任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而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 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夹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踉跄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总书记关于“党政分开，党不可过多干政”的郑重宣布——这不就等于说，“党天下”是要不得的吗？还有那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1988年夏，

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他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他说了，他是这样说的。老友，老友，你听见了么？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至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魂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在这里，谨向储安平先生的老朋友夏移今、冯章燕、林元、袁翰青、李义、刘啸虎、袁影尘、梁漱溟、徐铸成等诸位先生及在查找文献过程中给以大力帮助的雍桂良、周国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场烂污

储安平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前面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象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伤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

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象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而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而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金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而自有道理。严格的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

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象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

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

附录 2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党天下”)

(在6月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储安平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米,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

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而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